

学生成长百卷读本 83

环球新视野



CHUYINGWENKU

中国档案出版社

华夏文化惊四海

伯明翰中国艺术节

我们祖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和传统艺术是世界少有、根底深厚的。它们在世界各国的人们中引起对古老的中国的敬意和钦佩，给我们祖国和人民带来了光荣。

提起伯明翰，它既不像美国的政治首都华盛顿，也不像经济首都纽约或太平洋东岸的大城市洛杉矶、旧金山，它没有唐人街和人数众多的中国移民，过去同中国打交道也不多。它对中国不大熟悉，中国国内的人恐怕对它也不大熟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却飘散着中国文化艺术。

4月15日是伯明翰艺术节开幕的日子。那天，一支人数虽不很多、却是色彩缤纷的游行队伍穿过本城的闹市。走在前面的是应邀前来参加艺术节的穿着仿唐服装的广西杂技团的团员。在这支队伍中男演员们舞起两条龙灯，女演员们挥动彩色长巾，翩翩起舞。在他们后面，当地的美国女青年跳起中国式的狮舞，穿着各种中国民族服装的美国小学生们边走边向地上摔着一种从中国进口的摔炮，发出一片劈劈叭叭的声音。此刻正是中午时分，从街道两旁办公楼里出来吃午餐的职员们纷纷驻足观看这支异国风味十足的队伍；由老师带领排在街道两侧参观的小孩子们乐得噢噢地尖声叫唤。

艺术节的活动确实称得上多种多样，包罗万象。例如：

——在市立艺术博物馆同时举办三项有关中国的展览：一、明清两代的中国古画展（不仅展出该馆自己收藏的作品，还有许多从全美各地博物馆借来的珍藏）；二、侨居纽约多年的一位华人老画家 C. C. Wang 山水画展；三、中国古代景泰蓝制品展。

——华裔音乐家的演唱或演奏会。

——讲授太极拳。

——中国时装表演。

——中国针灸表演。

——中国邮票展和中国儿童画展。

其中，最引人注目、令人深思的活动是几百名美国小学生的“画中国”活动。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图书馆和书店翻阅了一些照片和书籍，然后凭着他们仅有的一点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主要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画出了许多十分可爱的画。有弯弯曲曲的长城，有大熊猫，有中国古瓷花瓶，还有中国稻田和水牛。这些就是他们眼中的中国的形象，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幻想、憧憬、好奇和对中国悠久文化的尊敬。这就是中国文化在外国所得到的礼遇。

艺术节最活跃的中心是市内的鲍特韦尔礼堂。这座大礼堂被隔成两半，前面一半是观看杂技演出的地方；后面一半安排了一个“国际摊贩市场”，在这里设摊售货的占突出地位的是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和几个省公司所设的一些货摊，它们出售各种价廉的中国手工艺品。

普通美国人都只知道中国杂技好，但绝大多数人不亲眼目睹还是难以想象竟然这样精彩。一位观者以行家的口吻说她特别赞赏的是：中国杂技把过硬的杂技技术同典雅美丽的仿唐服装和古典舞蹈动作能够如此美妙地结合起来。

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的根底深厚，在作现场制作表演的几位广西工艺美术家身上同样得到印证。他们表演的刺绣、泥塑、剪纸、风筝和版画制

作，使得美国观众看得目不转睛，赞叹不已。

伯明翰中国艺术节，使中国文化艺术在外国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展现，也使得更多的外国友人越来越热爱和尊敬中国文化。

文昌文化在国外

在四川剑门古蜀道南端的梓潼县境，神话传说“五丁开山”处的北侧，有一座天造地设的奇山。山上古木参天，宫观成群，紫气氤氲，令人飘飘欲仙。这便是神奇的“文昌帝君”发祥地，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访的“文昌古庭”：七曲山文昌宫。

“文昌帝君”是天人合一的综合体，即东晋大善人张亚子和天上文曲星的交融。张亚子曾经在此穷乡僻壤扶危济贫，传道解惑；倡文明，图昌盛；后人感其德行，将其神化，竟以天上“至文运”“司禄籍”的文曲星称誉。1700年来，文昌功德不胫而走，文昌信仰风靡全国。尤其宋、元、明、清以来，以文昌“降笔”名义编撰的《文昌帝阴鹭文》、《文昌大洞仙经》等诸多善书广为流传，景仰文昌的诗文、书画、雕塑、音乐等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崇尚文昌的民俗活动风行各国，敬奉文昌的宫观、塔、阁遍布华夏。凡此种种，充分反映了人们崇拜圣贤、渴求幸福的情况。这一切，构成纷繁多采的文昌文化，丰富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文昌文化不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都有广泛影响，并且进而飘洋过海，远播国外。

国外最早接受文化的要算朝鲜。至迟15世纪初叶，文昌文化已传入朝鲜半岛。据柳得恭(1748—?)《盗叶记》卷2记载，李氏王朝太宗十七年(1417)，明成祖朱棣赠送朝鲜《善阴鹭书》六百部。此事在《李朝实录》中也有记述；太宗十七年，国王派使臣金渐、文闾生送韩、黄二女入宫，明成祖“赐菩萨”、“如来歌曲三百本”，“神僧传三百本”，“礼部尚书执金渐手曰：‘此歌曲不颁于诸国，惟汝朝鲜礼义之邦，且敬爱殿下，故特赐之。’”可见这是中朝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所谓“歌曲”，当指可供讲唱的经文；而“神僧传”则系道、佛事迹。因其内容重在劝善惩恶，修身养性，统称为“善书”。这六百部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鹭文》、《文昌帝君劝学文》、《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等文昌经诰；还有别的经书，如《三圣训经》(关圣·文昌·孚佑)也包含着文昌训戒。这些文昌经诰，首先在王宫和道观中流传起来。

随后，朝鲜的宫观开始供奉文昌帝君。李朝世祖十一年(1466)，国都汉城道观昭格殿扩建改称昭格署，其中的三清殿内，便设有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的神位，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等同居一殿。显然，文昌帝君是作为道教尊神敬奉的。都城如此，别的道观也加以仿效。从此，文昌帝君广受朝鲜人民的瞻拜。

明成祖赠送朝鲜王的善书都是汉文本，一般的朝鲜人难以阅读。为了扩大读者面，朝鲜的学者和宗教界做了两项解除阅读障碍的工作。一是翻成朝鲜文。英祖十一年(1734)，出版了朝鲜文译本《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生延嗣妙应真经》。译本更为盛行的是高宗时代。仅高宗七年(1870)，一年里就至少刊印了四种文昌经诰译本。当年，昭格署遵奉王命，编译了分别以《过化存神》和《敬信录谚解》为总书名的两批善书，前者刊有《文昌帝君阴鹭文》、《文昌帝君劝学文》等。同年还出版了内含文昌训示的《三圣训经》译本。二是为文昌经诰作注，编印朝鲜文注释本，流行于世的如《阴鹭文注解》。

由此看来，文昌文化在朝鲜的传播，大致经过四个步骤：始于明成祖赠

书、继而宫观设祭，再则翻译出版，进而注解经诰。

文昌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则有着不同的情况。文昌经诰传入日本大约在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根据已发现的材料，日本最早接触文昌经诰的是十七世纪中叶撰有《养生训》的著名文学家贝原益轩（1609—1677）。贝原读过文昌帝君劝善书《阴鹭文》，并在其著述中有所反映，看来这类善书是通过中国清初东渡日本的隐元禅师和自中国回归日本的心越禅师传入的。隐元（本名兴侏）也回到日本，二人分别成了黄檗宗和曹洞宗的开山祖师，致使中国善书在日本流传开来。文昌经诰很可能就是此间开始传入日本的。

江户末期，日本出现不少文昌经诰的日译本。如文政年间（1818—1829），出版的译本有《日语阴鹭文绘钞》（1820）、《文昌帝君丹桂籍》（1829）等。当时热衷善书、笃志修行的著名人物长谷川延年（1803—1887），十分崇拜文昌帝君，15岁即熟读《阴鹭文》，文政六年（1823）又喜获集善书大成的《文帝全书》（30种），便不惜巨资大肆翻刻成《文昌司禄宠仁梓潼帝君敕封》等单行本。分赠爱好者。这部《文帝全书》，后来出了全文排印本，昭和六十年（1985）还出了缩印本。

由此可知，文昌经诰传入日本的渠道，不是像朝鲜那样通过朝廷馈赠，而是借助僧道往来；文昌经诰在日本的刊行，也不缘于官方的提倡，而主要出于文人学士的热心，民间色彩较为浓厚。

日本收藏了相当丰富的文昌经诰。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就藏有以下10余种文昌经诰版本：

《文昌帝君事略》（1卷）附《文昌帝君文辞》1卷。明·张邦济辑《格致丛书》，万历中钱塘胡文焕刊本。

《梓潼帝君化书》（1卷，首1卷）明·张邦济辑《格致丛书》，万历中钱塘胡文焕刊。

《丹桂籍》（4卷，首1卷，末1卷，续编1卷）明·顾正辑，清·赵松一重辑，乾隆十四年同人刊本。

《梓潼帝君救劫宝章》（1卷，附《劝惜字纸文》）明·张邦济辑《格致丛书》，万历中钱塘胡文焕刊本。

《文昌帝君阴鹭注文》（1卷）清·姚元滋注释。

《阴鹭文广义》（2卷·附补阙一卷）清·周梦颜释义，清·释印光补阙，乐善社辑《福寿宝藏》，上海大众书局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阴鹭文图说》（4卷）清·黄元正绘图解说。

《阴鹭文集证》（1卷）清·阙名集证，乐善社辑《福寿宝藏》，上海大众书局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阴鹭果报图注》（不分卷）清·黄元正。

《文昌孝经》（1卷）清·黄元正图注，光绪十七年点古斋石印本。

《文昌孝经》（1卷）清·朱石校，乐善社辑《福寿宝藏》，上海大众书局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文昌帝君省心录》（12卷）清·四香居士辑，本安省天竺阁书局藏版，皖怀最乐斋光绪十九年刊印。

《注生延嗣妙应真经》（1卷）清·雍正十二年朝鲜活字体本。

《文昌圣训辑要》（1卷）清·道光二十五年湖南臬署刊本。

《文帝全书》（30种）昭和六十年缩印本。

以上所列文昌经诰版本，多数是我国传入日本的汉文本，有的在我国已

经很难寻觅；还有一些是日本人译印的日文本、日本学者的选本、辑本、或流入日本的朝鲜文本，在我国更是罕见。

日本学界相当看重文昌文化。代表文昌主体思想的《阴鹭文》，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收入日文本《世界圣典全集》。文昌经诰至今还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日本现代著名东方文化学家酒井忠夫研究过《阴鹭文》，并考证其产生背景；女学者石昌井子撰写过《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与上清大洞真经的关系》等论著。

在东南亚国家，也不乏文昌文化的踪迹。

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佛寺，寺里便建有一座堂皇的“文曲星官”以主文运的文昌帝君，寄寓文化繁荣昌盛之愿。

新加坡的广福古庙、玉皇殿等庙宇，也供奉着文昌帝君的神祇。

越南的首都河内，在美丽的还剑湖玉山岛上有一座建于18世纪的玉山寺，1843年改为玉山祠，祠里供奉文昌、关帝和兴道王三圣。文昌、关帝都出自我国，一文一武；兴道王则是越南陈朝宗室、大文学家、抗元英雄陈国峻（1226—1300）。这是中越两国圣者的合祠，也是中越人民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象征。该祠建筑风貌显然以振兴文教为主题；大门外的桃腮山上，高耸五层石塔一座，顶端状如毛笔，故有“笔塔”之称。门内有一砚台形方池，池水墨绿，称为“石砚”。正门由四根石柱构成，柱顶一律形似毛笔；迎面两堵照墙，分别饰以龙、虎图案，象征“龙榜”“虎榜”，暗喻“金榜题名”。墙上题汉字对联：“人间文字无权全凭阴德；天上主司有眼单看心田”，表现了要求科举取士必须择选贤良和平等竞争的愿望。可谓处处体现文化教育，也处处关联“主文运”、“掌桂籍”的文昌帝君。

在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北美、南美、欧洲乃至非洲、澳洲的一些国家，也可以发现文昌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主要显示于华人社区和道教宫观。一些华人中还流传着文昌经诰、文昌语录或崇敬文昌的书画作品。

江西文化在国外

江西文化最早可追溯到 4、5 万年以前，经过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以后，在唐宋、明清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光大。

东晋时即有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唐宋八大家”中江西有三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北宋有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南宋有理学大师朱熹；宋末有民族英雄、诗人文天祥；明代有大戏剧家汤显祖创作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明末清初有大画家牛奂，号八大山人，明代有大科学家宋应星，其所独撰《天工开物》，国际学术界称之为“17 世纪中国工艺百科全书”。自唐以来，江西还是中国宗教的一大中心。尤其是道教、道经中所谓 72 福地江西有 13，最著名的是庐山东林寺、樟树阁皂山和贵溪龙虎山，龙虎山的张天师屡受唐宋皇朝的召见封赐，是南宋道教的祖师。

江西是茶茗之乡，起源于茶灯、采茶调、民歌等民间艺术形式的采茶戏，是江西另一特色浓郁的地方剧种。江西采茶戏分为高安采茶戏、南昌彩茶戏、抚州采茶戏、吉安采茶戏和赣南采茶戏五个支派，共有 37 个剧团。在 50 至 60 年代，高安采茶戏《小保管上任》、《孙成打酒》和赣南采茶戏《哨妹子》、《茶童戏主》曾风靡全国。

江西戏剧艺术还有京剧、歌舞、话剧、杂技以及越剧、黄梅戏和木偶戏等。杂技节目《晃梯顶碗》1991 年获第四届摩纳哥基万尼斯杂技节最高荣誉奖——“金 K 奖”，还有《转动地圈》、《小跳板》、《飞天》、《球技》等获国内比赛大奖。

江西瓷文化和青铜文化独具特色。瓷皿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独特成果，江西景德镇自唐、五代以后，瓷业兴盛，生产的青白瓷“青如天、白如云、薄如纸、声如磬”，宋代景德镇窑是全国最著名的瓷窑之一，至明代景德镇成为全国瓷业中心，因而有中国瓷都之称。在 1978 年在樟树发现大型商代聚落遗址、吴城遗址，有清晰的村落，有古道遗迹，出土大批陶器、铜器等；1988 年在瑞昌铜岭发现商、周铜矿采掘冶炼遗址，发掘出采矿巷道和冶炼皿以及陶器、铜器等；1989 年在新干大洋洲发现商代大型墓葬，出土大批精美青铜器、玉器、陶器。樟树吴城、瑞昌铜岭和新干大洋洲遗址相互印证，史家称为“青铜王国”。

江西文化建设颇有成绩：目前全省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 104 个、文化（群艺）馆 113 个、博物馆和纪念馆 80 个、专业剧团 77 个、演出剧场 60 个，电影院和影剧院 310 家。90 年代以来省政府投资近 3000 万元新建了有现代化规模的江西图书馆，投资近 6000 万元重建了设备先进、齐全的江西艺术剧院，投资超亿元新建集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于一体的江西博物馆。还在有关地县修建了集中体现江西历史文化成果的十大文化名人纪念馆：陶渊明纪念馆、曾巩纪念馆、朱熹纪念馆、文天祥纪念馆、汤显祖纪念馆、宋应星纪念馆和八大山人（朱奂）纪念馆等。近、现代，江西人民坚持爱国主义精神，擎起反帝反封建旗帜，创造了现代文明。为纪念历史，教育人民，修建了井冈山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萍乡安源煤矿工人纪念馆、瑞金中央根据地纪念馆等。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文化逐步走向世界。戏剧艺术最先走出国门。之后江西省杂技团赴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日本、德国、荷兰、泰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比赛和演出，1985 年在巴基斯坦演出受到总统齐亚·哈克将军接见，1986 年在土耳其受到总统接见。江西省赣剧团 1993 年、1994 年两次赴新加坡参加狮城艺术节，演出《荆钗记》、《窦娥冤》等剧目很受称赞；1992 年又赴香港演出，十余家报刊争相发表评论文章，称他们“演神了”，1992 年和 1993 年还先后三次派青年表演艺术家去台湾讲学、交流技艺。赣南茶剧团 1995 年组成客家歌舞团前往香港演出。1997 年早些时候，省京剧团将组队去台湾演出。

江西民间艺术也已走出国门。1988 年瑞昌剪纸作品 8 件送美国得克萨斯州展出，并被收藏。1992 年景德镇工艺美术瓷在法国展出，受到高度赞扬。1992 年萍乡农民画赴法国展出受到欢迎。专业和业余作者创作的美术作品于 1991 年送孟加拉国展出受到称赞。江西省出土的陶、瓷文物，先后于 1995 年在日本、英国展出，1996 年在台湾展出。省少儿文艺影响及于海内外，南昌市少年宫合唱团 1995 年应邀赴台湾高雄市演出，江西省少儿艺术团先后赴日本、泰国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80 年代以来，国外，境外艺术团队来江西演出，专家学者来江西访问、考察、研讨等达 129 批（次）之多。由省举办的两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一次是 1992 年 12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南昌举行的“亚洲艺术教育国际研讨会”，另一次是 1993 年 8 月 19 日至 23 日在南昌举行的“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有海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参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江西人民热情、友好，将更多、更好地推出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江西文风的倩影在国外也异彩纷呈。愿江西文化更好地发扬光大，愿世界人民能通过江西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相信，中国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能在世界大舞台上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给中国增添更多的光彩。

中国文物展在国外

1994年，中国在海外举办各类文物展览20多个，受到展出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一、《中国西藏珍宝展》在意大利

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与意大利菲亚特集团属下的复兴集团及千里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西藏珍宝展》经过3年多筹备，于1994年3月1日在意大利米兰揭开帷幕。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意大利举办西藏文物展览，也是中国近年来在欧洲举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西藏文物展。展品包括从新石器时代至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艺术珍品109件（套），较全面地反映了西藏历史文化的沿革和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展览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西藏珍宝展代表团的藏族专家向观众介绍了展品并解答了各种问题，展厅内播放介绍西藏风情的电视片，使观众增加了对西藏珍宝和今日西藏的理解，气氛十分热烈。

这个展览展出时，正值西藏平定叛乱35周年、第13届国际人权会议在瑞士举行，因而出现了复杂的政治背景。少数的意大利人和藏侨聚集在展场外，扬言砸烂展场。意大利个别报刊也推波助澜，刊登歪曲西藏历史，污蔑中国的文章。针对这种情况，代表团主动接受记者采访并广泛散发材料驳斥谣言，正面阐述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代表团巴桑副团长还以亲身经历，介绍了自己和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在农奴制下悲惨的奴隶生活和解放后当家作主的动人事例，有力地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获得自由，人权得到重视，广大奴隶摆脱了比欧洲中世纪更为残酷、黑暗的奴隶制生活。进行采访的亚登克洛诺斯通讯社记者表示，过去不了解西藏，听了巴桑的一席话很受启发。该社以《我们不再是奴隶》为题，将巴桑的讲话发了新闻稿。

尽管出现了种种干扰和复杂情况，《中国西藏珍宝展》仍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意大利引起轰动。在实际展出的49天中，观众总数达75000人，最多一天观众达3500余人。通过展览，意大利观众看到了独特的藏族文化，了解到汉藏自古以来同祖国中华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了解了西藏文物并未遭到破坏，居住在意大利的藏胞也对保护完好的西藏文物由衷地感到满意。

二、在韩国举办《中国秦代文物展》

由陕西省对外文物展览公司与韩国戈孙株式会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秦代文物展》于1994年8月16日在汉城国立民俗博物馆正式展出。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韩国举办秦兵马俑展览。韩国总理李荣德、汉城特别市长李国钟、韩国文化部长官李敏变、中国驻韩大使张庭延、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王文清等为展览剪彩。出席开幕式的还有韩国国会议员等各界人士300余人。韩国第一大广播公司KBS及MBC电视台、东亚日报等都对该展内容及开幕盛况进行了报道。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由于观众太多，不得不采取间隔售票办法限制人数。有时等待购票的观众队伍长达二三百米，观众中有许多学生，也有不少父母带孩子来参观。在展厅的纪念品柜台，秦代文物复制品成了抢手

货，供不应求。不少人在看完展览后纷纷打电话到中国大使馆询问如何办理去西安参观的手续，希望到兵马俑的故乡亲眼一睹秦俑军阵的壮观局面。

三、《世界文明摇篮之一——中国》 展览在德国

应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市罗莫—佩利酋斯博物馆邀请，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提供展品组成的《世界文明摇篮之一——中国》展览于1994年7月16日在德国开幕。展览由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说唱陶俑等272件（套）珍贵文物组成。

在有300余人出席的开幕式上，乐队和歌手演奏、演唱中国音乐。在音乐的间隙，中国大使梅兆荣，希市市长，州文化部长等先后致辞，罗莫—佩利酋斯博物馆馆长艾格·布莱希特教授介绍了举办“中国”展的初衷和展览内容。一位汉学家介绍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明。场内笑声、掌声不断，气氛十分热烈。晚8时，组织者在始建于1540年、颇具中世纪风格的酒店举行了庆贺酒会。《科隆日报》、《布朗斯来克市报》、《汉诺威日报》等报纸均发表了文章并配发照片，介绍中国文物展。德国三家电视台播放了开幕式新闻，一家电视台播放了12分钟的专题片。

除上述展览外，1994年在海外举办的文化展还有在日本京都举办了《大唐长安展》、东京的《秦始皇及秦代历史展览》、在美国洛杉矶等地举办的《中国内蒙古成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在墨西哥举办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展览》、在新加坡举办的《宋元明三朝文物展》、在意大利举办的《秦兵马俑展览》等等，这些展览仿佛一幅幅绚丽的画卷，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历史文化，增进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也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曹禺剧作在国外

曹禺是享有国内外盛誉的戏剧家，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与他的博大精深的学识不无关系。他不仅掌握和继承中国的文化艺术传统，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知识有丰富的修养，而且他重视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的文化经验。因此在他的剧本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外国优秀戏剧的影响，也可看出他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深厚的民族传统。而这样兼收并蓄的产物不仅在国内是家喻户晓，在国外也有很广泛的影响。

曹禺的剧作在国外演出最多的是《雷雨》。1935年《雷雨》译成日文、并由中华话剧团（留日学生戏剧团体）在东京郎田一桥讲堂首演，引起日本人士的注目。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看后撰文加以推荐。1938年中国留东剧人协会又在东京郎田一桥讲堂公演了《日出》。日本大阪关西大学中文系学生还用汉语表演了《雷雨》。日本东京民艺剧团上演《日出》时，曹禺为这次演出写了《作者的活》，发表在《民艺之友》上。这两出戏的演出使曹禺在日本戏剧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

《雷雨》演出场次最多的国家是前苏联。上演的剧院有塔什干高尔基剧院、莫斯科中央运输剧院、莫斯科普希金剧院、阿塞拜疆剧院。据统计，前苏联各剧院演出《雷雨》近2000余场。除此，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人民剧院、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诺塔拉”剧院、捷克土瓦连城耶·格·塔约夫斯基剧场都上演过《雷雨》。《雷雨》译成美、日、俄、法、朝鲜、越南等几国文字出版。

曹禺的其他剧本如《日出》，除了在日本，美国、前苏联演出外，布达佩斯斐多菲剧院也上演过，受到匈牙利观众的欢迎。《原野》由日本学者饭冢客译成日文。凌子风将《原野》改编、摄制成影片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受推崇电影”的荣誉称号。

曹禺剧作所以能超越国界，在国外产生影响，使他成为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剧作家，与他扎根本国民族文化沃土，又重视学习、借鉴外国经验，积极开展与外国戏剧交流活动有关。中国的戏剧要得到发展，需要加强与外国戏剧的交流，既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和经验，使中国戏剧走向国际舞台，为人类文化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陕西秦陵兵马俑在国外

1982年11月，在美国中部田纳西州举办的诺克斯威尔世界博览会上，中国馆展出了陕西省出土两千年前的秦代兵马俑，轰动了整个博览会。这是我国秦兵马俑在国外展出取得的又一次更大成功。

自从1974年陕西秦俑坑大量兵马俑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各国，引起各界极大兴趣和关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些军容严整、排列有序的兵马俑不仅再现了当年秦始皇“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驰骋沙场，统一中国的壮观图景，也为后人研究秦朝政治、军事、冶金、艺术等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为了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从1980年起，我国先后组织了不同形式的秦兵马俑展览，到日本、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丹麦、瑞士、比利时、香港等国家、地区展出。

在各地展览馆、艺术馆、美术馆展室内展出的形象威武、身高1.80米左右的兵俑和膘肥体壮、高1.5米，长2米的陶马，一个个栩栩如生。将军俑头戴鹤冠，披甲按剑、表情严峻；军吏俑鬃须直立，双唇紧闭、神态庄重；士卒们，有的头部低垂，双眸微睁，有的神思怔忡，凝视空茫。许多参观者在这些千姿百态的秦俑塑像面前浮想联翩，流连忘返，外国朋友们对我国两千年前的工匠们如此高超的雕塑技巧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赞叹不已。

秦兵马俑的展出，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展览每到一地，都受到展出国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各国政府首脑、内阁部长、王室成员前来参观，并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送来这样珍贵的文物表示感谢。各国新闻界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欧洲舆论界把兵马俑的展出视为“一次非凡的、轰动一时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比利时《列日报》评论道：“亲爱的读者，快去美术馆看看，当我们还在漫长的黑夜里时，中国人在干什么？！”许多国家报刊把来展的秦兵马俑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派来的文化大臣。

各国政府直接关注到兵马俑展品的安全，专门配备了警卫人员日夜巡逻，展室内装置现代化的警报系统，确保展品的安全。法国曾在每个兵俑的四周站上四名威严的士兵为警卫。

秦兵马俑的展出，给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诺克斯威尔博览会上，我国工作人员询问了许多参观者：“你最想看的是哪个馆？最喜欢的是什么展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最想看的是中国馆，最喜欢秦兵马俑。”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馆只展出了两个兵俑，一匹陶马，就在仅6个月内吸引了1200万人前来参观。这样多的参观者在历届博览会中是罕见的。在比利时，有一个家庭的曾祖父把全家祖孙四代46人召集在一起，从千里外的安德卫普乘火车赶到布鲁塞尔参观展览。在兵马俑展出期间，各展出国的华侨、台湾留学生也争先恐后地前来参观。有位上海籍老华侨带着孙子四次来展览会看兵马俑。老人在最后一次临走时，流着眼泪对我随展工作人员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的祖先太伟大了。展览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使我们的腰杆子硬了，我要让孩子们永远记住我们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后代。”在中国随展工作人员办公室里，经常挤满了大、中、小学生，他们以极大的兴趣，询问各种有关中国的问题，表现出各国青年渴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最近，在澳大利亚掀起了秦兵马俑热，人们纷纷购买秦兵马俑的复制品。到目

前为止，我国文物部门已经运到澳大利亚几批兵马俑复制品，但仍供不应求。
中国秦兵马俑展览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贡献。

中国园林在国外的的发展

中国园林艺术由来已久，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古典园林开始走向世界。现在美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智利、澳大利亚、瑞典、日本、新加坡等国已建成一座座精巧美观的中国式园林。

首先，我们谈一下圣地亚哥的“中国公园。”它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奥伊金斯公园内。1963 年由智利华人集资建成，方圆 3000 平方米，布局精致，号称“东方琼岛。”半岛山坳有幽洞，洞壁陈列水族玻璃橱窗。山巅有中国式凉亭和瞭望台，还有花架曲径，沿石阶通向湖边，公园三面环水，人造奇峰环岛而立，峰隙喷泉如细雨溟蒙。园门内有约 5 米高的彩绘牌坊，牌坊前端坐两只石狮，并有一株参天的喜马拉雅松。园内广种合欢树、香椿、桑、榆、泡桐等，成为圣地亚哥旅游胜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在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中，有没有中国园林的情影。噢，你看，“裕华园”。裕华园建于 1974 年，总面积达 13.5 公顷，位于新加坡裕廊河畔。园内主要建筑均仿照中国园林艺术建造而成。园内水陆相间，曲折幽深、门楼、牌坊、拱桥、长廊、云塔、月舫等布局精巧，错落有致，独具匠心，别有风味。园名取自“裕”廓和中“华”。在新加坡，裕华园享有胜誉，成为花园城市的大景致，包含了中华民族的精髓，成为广大观光旅游的好去处。

在另一个城市温哥华，又可以见到另一个中国园林的模型，那便是“逸园”。逸园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唐人街内。它是 1986 年由华人和江苏省捐资兴建而成，占地面积 1400 平方米。国内的建筑按苏州拙政园的轮廓，沧浪亭的亭，网师园的堂，苏州园林的精华。全园分为 4 个景区，建筑精巧，妙趣盎然。那别致的山水池，相映成趣的树木花卉，显得曲径幽深，宁静安逸，优美雅观。现已成为温哥华的主要景区之一。

谈起悉尼，大家一定会想起悉尼有名的俱乐部。孰不知在位于澳大利亚的悉尼达令港畔，有一个“中国花园”，此花园占地 10000 平方米。该园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并提供材料，中国园艺专家协助建造；新南威尔士州提供园地及一切费用，共耗资 1700 万澳元，于 1984 年 2 月建成。此园具有中国传统园林特色和岭南园林风格，设计新颖独特，建筑精巧美观，它融楼台亭榭、小桥流水于一园，景色迷人。全园共分门庭景点、竹石山房、山涧瀑布、翠云阁、山林野趣、侨乡水院等 6 个景区。园内的“双龙壁”“双面壁雕”仿北京九龙壁而制作，别具中国民间艺术特色。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中国花园”。

在世界服装城巴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称之为“中国城”的地方。它位于法国巴黎市郊的塞纳河和马纳河汇合处，由香港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顺德县得胜置业有限公司和旅法华人陈锡南等合资 3 亿法郎于

1991 年建成，占地 1.2 万平方米，其建筑项目包括牌坊、四层城楼、六层船舫、十二层旅业楼、四层商场、四层钟楼、六十米长的右雅食街、苏州庭院式大花园等十大部分。可以称得上是古香古色，诗情画意，典雅之味浓郁。

在佛州有一“锦绣中华公园”，它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奇士美市。由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1 亿美元于 1993 年 12 月建成，占地 76 英亩，园内建有故宫、天坛、长城、兵马俑、敦煌壁画、乐山大佛、苏州园林等 60

个微缩的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景点。这个公园根据外国人好动的性格、设计采用动静结合的形式，在各个景点散布着 3 万多个神态各异、维妙维肖的陶塑小型偶像，使人感到“此外无声胜有声”。它成为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的窗口。

在亚洲的日本横滨，还有一个“友谊园”。它位于日本横滨市民公园的人工湖上，按照上海园林风格兴建而成，由九曲桥、湖心亭、玉兰厅三部分组成。厅堂正门是一座牌坊门，进门是古香古色的小庭院，院内正面是主建筑玉兰厅，对面立着一块太湖石。步出玉兰厅，沿着九曲桥，就来到湖心亭，在亭内可观赏园内景色和眺望人工湖美景，可以说是天上人间的好去处，同学们若有时间，不妨来此一游，领略一下此地的园林，再与中国园林对比一下，说不定你会得到些独特的感受。

在日本另一个城市——冲绳县首府那霸市松山公园对面。有一“福州园”。它是那霸市与福州市结成友好城市后，由那霸市政府出资，福州市政府负责设计施工的“缩影公园”。园内建有福州市的主要风景名胜，如千山、鸟山、白塔、乌塔、西湖、飞虹桥、冶山、冶亭、屏山、闽江、万寿桥等 20 多个景点。现成为那霸市又一处新的旅游景点。它具有中国古典优雅的对称性的建筑风格，融中国与日本建筑风格于一体，其园中景色，美不胜收，倒垂的杨柳、碧绿的波水、木结构的建筑，无处不散发着中华民族的气氛，那种韵味，那种情调，让今人为之宁静所感，为之典雅所动。使当代繁忙的日本人在假期之余，可以使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使人们能精神饱满地去面对明天更忙的工作。所以将中国的清静淡雅的园林之气传入日本，无疑也是日本的一大需求。

以上谈到了中国园林艺术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些影子。他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中的一颗璀璨的名珠，他的异彩照亮了中华民族——这条中国龙，它的博大精深的创意和造形，不仅给中国人，而且给世界人以清静淡雅之美的享受。在园中，你可以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也可尽情领略大自然的造物之异彩。可称为中国为世界的又一伟大贡献，中国将园林这一瑰宝献给世界，将世界打扮得更加美好。

中国园林，相信他会在国外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愿这颗明珠越加明亮。

凤仙功在日本的传播

凤仙功，一种在中国气功和中国传统舞蹈的基础上，融创建者个人的艺术感悟而发展起来的崭新舞蹈艺术形式。近年来颇有气候。创建者杨铃为中国中央歌舞演员。80年代初，她与同是该团舞蹈演员的丈夫阎仲珩东渡日本，开始了崭新然而困难重重的生活。

赴日前，阎仲珩是中国中央歌舞团舞蹈节目的顶梁柱，有良好的技艺基础，到日不久，就找到一份舞蹈教师的工作。当时参与竞争的有很多人，其中有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等，但阎仲珩硬是在众多应试者中以他对于中国舞蹈的知识和技艺以及他对其它舞蹈形式的认知水准一举赢得考官的赏识，以令人信服的水平获得了这份难得的工作。获聘后，阎仲珩积极传播中国舞蹈文化，尽量影响日本学生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在他努力下，这个学校不断举行中国舞蹈表演会，日本《朝日新闻》为此于1996年初刊载了专门文章，向日本全社会广泛地宣传了中国舞蹈在该校普及的情况。阎仲珩，这位性格爽朗、意志坚韧的山东汉子的脸上，终于绽露出成功者的微笑。

在传播凤仙功的过程中，阎仲珩的妻子杨铃也付出了自己的辛勤汗水，就是她的非凡创意，塑造了闻名遐迩的“凤仙功”舞蹈。

下面，说一下杨铃。杨铃出生于中国北京。从童年时代起，在气功领域其父杨弓芳便给她极大的影响。在踏上舞蹈之路后，父亲又不止一次地告诫她应当充分利用前人留下的丰富遗产，使这年少的杨铃于朦胧中产生了某种无法言传的志向。在残酷的舞蹈之路上，经过多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磨练，她终于成为一位相当称职的专业舞蹈演员，开始用汗水在舞台上书写着自己的青春。这段生活经历为她日后的成功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在二位初到海外时，这对伉俪经受住身处异邦的种种风风雨雨，凭着中国人特有的耐力和能力，他们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织出一张张播撒中国文化的网，终于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再来说一下“凤仙功”。它是一种运用中国传统气功的某些训练原理发展而来的舞蹈形式，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意蕴。它将自然、人体、意识揉成一体，以中国美学理想的“凤”之形象为舞体征象，具有独特审美魅力。它将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化境，通过舞动的方式完美地揭示出来。

“凤仙功”具有表演和训练双重价值，这也正是它能紧紧吸引日本各年龄层女性的根本原因。杨铃以“凤仙功舞俑”为旨趣，创作出一系列舞蹈作品，它们像一首首缓缓流淌而出的隽永雅丽的诗，很耐咀嚼，她那善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舞蹈动机的智慧与灵性，为具有中国气派的舞蹈百花园添上了一重亮丽的景色。

逆境出人才，艰苦的条件往往能促成奇迹的发生。舞蹈科班出身的杨铃，以不可思议的毅力，竟在很短的时间中用自己刚刚学会的日文，写出了日文版的《凤仙功舞俑》一书，由日本德间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从此以后，杨铃的创业经历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考验和丰收。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凤仙功舞俑”于1991年在日本正式公开表演，1992年在东京公演。1993年，“日本凤仙功舞蹈团”正式成立，阎仲珩任团长，杨铃任艺术总监。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93年8月，他们带着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一团人马回到了他们阔别八年的祖国，在北京进行了首演。当时中日一些传媒广泛地报导了这一盛事，一时间，在中日两地均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专家认为，“凤仙功

舞蹈”不仅优化了中国舞蹈的构成，同时在艺术水平上也有极高的成就。

1996年6月，已改艺名为“大凤真阳”的杨铃，以一舞《踏花》一举赢得“全日本首届编导大奖赛”的唯一金奖，这一殊荣使她立即成为日本电视台NHK的座上宾，为此，NHK向全日本播放了由她创作的优秀舞作，在日本文化界产生轰动影响。在新宿州（一个寸金难买寸土的繁华地区）的练功厅经常挤满了前来观摩学习的日本同行，他们惊讶地发现，这时中国人的工作条件竟在他们之上。而他们哪里知道，取得今天的成绩，是中国人付出的怎样的代价换来的呀！

功成名就，荣誉与鲜花一并拥来，阎仲珩和大凤其阳此刻想到的不是过去的成功，他们正站在一个新起点梦想着新的腾飞。飞吧，这对来自中国舞坛的比翼鸟，——愿你们衔着中国文化的春泥，在新的土地上继续播种育苗，让那番不凡的舞蹈事业继续发扬光大，相信这份努力会给中日舞蹈界的交流带来新的活力和意义。

她的“中国料理”迷住了日本人

1973年，世界烹调大赛在日本东京希尔顿饭店举行。一位女士表演了中国山西刀削面，只见她不慌不忙，一手稳稳托起一团和好的面，一手持刀飞舞，一条条粗细均匀的面条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准确地落在锅里。娴熟的手艺，精彩的场面，使在场的观众和评委看得入了迷，连声赞叹：“太妙了！太妙了！”她就是旅日华人张馥卿女士。这次表演，她因其先生梁颀武亲自翻译：一个技艺高超，一个翻译生动，配合默契，珠联璧合。

张馥卿女士又名张福青，1919年6月出生于山西省汾阳。从小她就对烹调很感兴趣，少年时期到北京上学之后，就更注意研究京菜菜系的特点和制作工艺。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练就了一手烹调好手艺。1950年10月，她随毕业于日本东京商科大学的梁武自香港飞往日本定居。从此，张馥卿发挥自己的烹调特长，为弘扬中华饮食文化贡献自己的全部热情。

自1960年起，张馥卿女士就在《妇女之友》主办的料理培训班传授中国烹调技艺。随着日本的中国料理热的兴起，小范围的传授已满足不了众多中国料理爱好者尤其是日本家庭主妇的学习要求，从70年代开始，张馥卿女士开始在电视台和《读卖新闻》上介绍中国烹调，特别是花样繁多、制作精巧的面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此外，她还应邀在《主妇》、《家庭画报》、《朝日百科》等杂志开辟专版介绍中国料理，有的杂志甚至还推出《张馥卿女士一周的家庭菜谱》，备受读者青睐。日本的一些大学特聘她去教授的烹调课，大受学生与家长的欢迎，学校的声望也因而得到提高。张馥卿女士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各界人士尊称她为“中国烹调研究家”。

在朋友聚会时，张馥卿女士的烹调手艺也是大家最喜欢的“节目”。特别是来她家聚会的日本朋友，经常可以尝到她做的菜肴，总是赞不绝口，说：“中国料理真是太奇了！太迷人了！”“新制作座”是日本的一家对中国怀有友情的艺术团体，一贯把梁武夫妇作为良师益友，经常邀请精通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梁武先生去指导排练，切磋艺术，也经常请精通中国饮食文化的张馥卿女士去教中国料理。他们认为：中国料理同样是一门艺术，其魅力同样是难以抗拒的。张馥卿女士除了教演职员制作中国料理，还教大家唱中国歌曲。每次上课，大家有说有笑，又唱又跳，人人沉醉在中华文化和中日友谊交汇的欢乐和谐的气氛之中。

作为炎黄子孙，海外赤子，张馥卿女士对于社会主义祖国魂牵梦萦，一往情深。当第一次回到阔别20多年的祖国时，她的心情格外激动。她回日本后在《华侨报》上发表的《在祖国温暖的日子里》这样写道：“家乡的变化真叫我吃惊……泥街变成了大马路、鼓楼变成了大高楼，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过去的山村只有羊肠小道，吃水都困难，如今能开进汽车，吃水有了水井……这些大变化，我以前是做梦也梦不到的！”

张馥卿女士现在虽年过古稀，但仍精神矍铄。对于弘扬中华饮食文化，她仍乐此不疲，不时地“露一手”。她说：“看到日本人这么喜爱中国料理，我很高兴！文化的交流是不应该受国界限制的。我希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更多地走向世界！”

孔子学说在日本的传播

一、《论语》传入日本与释奠之礼

孔子的学说成为儒教以后，传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在安南、朝鲜、日本等亚洲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在 17 世纪以后，又通过耶稣教教士广泛地介绍到欧洲。在这里，关于孔子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做一点简单的叙述。

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 285 年）和百济之王仁（和迺吉师）来日本，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这是汉籍传入日本的开始。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之太子菟道稚郎子曾跟王仁学过典籍，其中大概也包括《论语》。大家知道应神天皇之后的仁德天皇自高台见民间炊烟缕缕而高兴的故事，这个故事表现了天皇的仁慈。《日本书纪》记载，当时仁德天皇说，“朕既富”，又说，“君以百姓为本”。显然这出自《论语·颜渊九》：“百姓足，君孰不足。”到撰写《日本书纪》的时候（公元 720 年），在日本已有许多人熟知《论语》了。据记载，在大化革新的前夜（公元 644 年），中臣镰足曾与中大兄皇子一起跟南渊先生学过“周（公）孔（子）学说”。那时，曾经在中国唐朝学习过的人陆续回到日本，圣人孔子也逐渐被许多人知道了。

祭奠孔子的释奠之礼，最初见自《续日本纪》大宝元年（公元 701 年）条下，即飞鸟时代的文武天皇的时候。四年后，在大学寮举行的释奠的祭文称孔子为“故鲁司寇孔宣父之灵”，似是模仿中国文章的模式；祭文中写了孔子的事迹和传记。在奈良朝的末年（公元 767 年）释奠时，座主、音博士、问者等人要发表讲话。次年，即神护景云二年称孔子为文宣王。膳臣大丘上奏天皇，16 年前，即天平胜宝四年，曾在中国见过唐玄宗规定的典礼，于是日本才称孔子为文宣王。这是唐玄宗做出这样的规定 28 年以后的事情了。从此以后，在日本也给孔子加上了王号。

此前，“养老令”之学令规定大学和国学每年春季和秋季要各举行一次释奠。学令还规定大学课目除王经外，还须兼习《论语》和《孝经》。与唐令相比，不同的是在必修课目中并没有《老子》。

关于这个问题，葛井广成应天皇策问写的对策文说：“我认为，玄《李耳》以独善为宗旨，弃文背君，无敬爱之心。儒（宣尼）以兼济为本，尊卑有序，致身尽命。由此可知其长短（《经图集》卷 20）。他明确地宣称儒教不同于老子之道，对政教有益。

平安时代设文章博士，明经博士、明法博士、算博士等四博士。读儒教经典的是明经道，后来成为世袭制，一直由清原、中原两家充当。清和天皇之贞观三年（公元 861 年），天皇第一次亲自讲解《论语》（《三代实录》），他把《论语》称为“圆珠径”。“圆珠径”的说法源于梁代皇侃之《论语义疏》。《论语义疏》序文中有：“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

后来，皇侃之《义疏》在中国绝版了，江户时代中期将日本版本传入中国，使清代学者大吃一惊。平安时代以古注即何晏的《论语集解》为中心学《论语》，也有人读过后汉郑玄的注释；从“圆珠径”这个名称来看，《义疏》也曾经被许多人读过。

二、儒教与佛教折衷

镰仓时代在大学寮举行的释奠已经不供兽肉了。按照中国的惯例是供猪。日本起初供野猪或鹿，但这不符合日本的国情，后来就废除了，以雉代猪。于是释奠之礼也逐渐日本化了。

在后醍醐天皇的时候，在朝廷里开始学习朱子的《论语》新注，取代了古注。据说朱子新注是由玄慧僧都介绍过来的（见《尺素往来》）。但是，当时朱子已经死了100多年，对其记录似有怀疑。此前，在整个镰仓时代，许多僧侣去中国留学，新佛教禅宗传入日本，同时也把宋学带到了日本。镰仓时代以后的禅僧们既学佛典，又学儒教，许多人站在二者折衷的立场上。

例如，北条泰时曾就政治问题问师父明惠上人（公元1173—1232年）。明惠上人答：“古人曰，‘其身正而影斜，其政正而国乱，是少见的’真正乃无欲也。”劝北条泰时修身无欲（《涩柿》）。这些话出自《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等孔子的话，并揉合了佛教天真无欲的思想。虎关师练等许多人认为儒与佛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根本原理是相同的，中严圆月（公元1300—1375）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他说，“孔子之道与佛教互为表里，由性质而论，如合双璧。”又说，若认为儒、佛相斥，实际是因为“拘泥其形，而不通其道”。

虎关师练在《元亨释书》（公元1322年）中说：“有人说孔子不讲怪力乱神，实际上孔子并非完全不讲，而是慎重。后来的儒家把它理解为完全不讲，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虎关师练认为孔子也和佛教一样是讲怪和神的。

在室町时代更有人主张神道、儒教、佛教是一致的。

三、儒教在武士中的渗透

在日本，很久以来一直学儒教，谈《论语》，尊孔子。但是，它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里。开始，这种活动以朝廷为中心，后来又加上王山的僧侣们，儒教作为学问还没有向大众公开。到了江户时代，它才在武士中传播，不久以后，它又被下层庶民所了解。

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曾经在江户幕府教学中建立了推崇朱子学的基础。他在京都的时候就曾向人讲解过朱子的《论语集注》。世袭讲解儒典的清原家认为这是未经允许的任意行为，而且又不学习传统的古注，于是清原家向朝廷提出申诉，要求朝廷处罚林罗山。朝廷不能就此事做出决定，于是和武士们商量。德川家康听说以后，对清原家的狭隘付之一笑。德川家康说，圣人之道任何人都可以学；无论是古注、新注，只要能多广泛传播就好（《德川实记》附录）。

丰臣秀吉家后，前回利家曾对加藤清正、浮田秀家、浅野幸长讲《论语》中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泰伯》），君子之节义。他担心的是丰臣家的命运和丰臣家的后嗣丰臣秀赖的命运。但是，加藤清正不学无术、未能理解其意。后来加藤清正与浅野幸长一起向藤原惺窝学《论语》，这才大有感受。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儒学在武士中的传播。

四、儒教的官学化

藤原惺窝（公元1561—1619年）建立了江户时代的儒学。他曾经向德川

家康等武将讲解过《论语》，他作为林罗山和松永尺五的老师而成为文运的中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脱离佛门，明确地打出了儒家的旗号。林罗山和山崎闇斋也明确地打出了儒家的旗号。原来被僧侣们放在折衷的立场上学习的儒学，现在独立了，人们认识了与佛教不同的儒学本身的价值。

在藤原惺窝的推荐下出仕德川家康的林罗山，成功地在幕府内外传播了朱子学。从此以后，幕府教学的中心就是林罗山的朱子学。孔子就像在中国一样，在日本也被人们当作圣人尊敬了。

祭奠孔子的释奠后来因战乱而中断了，但当时在林罗山的住内建造了一座大成殿，并安放了孔子的圣像，在春季和秋季分别祭奠一次。将军吉纲非常喜爱学问，在元禄四年（公元 1691 年）把东京神田的一部分命名为昌平坂，在这里设置“学问所”，并新建了一座大成殿，第二年他出席了释奠仪式，同时亲自讲解了《论语·学而》第一章。后来亮政十年（公元 1798 年）在汤岛重建圣堂，使之更加壮观了。现在仍然保存着的汤岛圣堂就是亮政十年建造的。走在汤岛大成殿的大院内，看到金黄色的屋顶，就能想像德川时代 300 年文运的隆盛。

现在不仅在东京保存着过去的圣堂，冈山其闲谷羹和山形县致道馆的旧址也被妥善地保存着。随着官学的普及，在各地建立了儒学学舍，学舍中心安放孔子像和木主，并举行祭祀之礼。

据说，“在仙台，讲解之初，儒者以若年寄为主，在铺着席子的房间的壁龛里有圣像，主君释后就座，然后讲师拜，与主君相隔一尺，面对而坐，开始讲解。”（《甲子夜活》卷 19）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尊崇孔子，作为正式礼仪，在全国盛行。

五、儒学与神道

山崎闇斋（公元 1618—1682 年）也是朱子学学者，但他与林罗山的官学派不同。他信奉朱子甚笃，甚至认为学朱子学错了也不后悔。但是，晚年他从儒学转为神道，创建了“重加神道”。他站在日本主义的立场上说：“我虽信奉孔孟，但是，若孔孟率兵来攻日本，我将以孔孟为敌，将孔孟俘虏。”（《先哲丛谈》）在论述儒学与神道的关系方面，受山崎闇斋学派影响的水户学认为，“奉神州之道，取西土之教，敬神崇儒，不偏党”（《弘道馆记》），站在既尊神道又尊儒教的应场上。

摆脱朱子学派并具有自己的特色的学派是古学派。它反对朱子学的严酷、无情、静态的非人性，要回到周公、孔子的古代，并以此命名为古学派。山鹿素行（公元 1622—1685 年）说，“我以周公、孔子为师，而不以汉、唐、宋、明诸儒为师”（《圣教要录》），这是古学派的宣言。

六、伊藤仁斋

古学派的代表是伊藤仁斋（公元 1627—1705 年）和荻生徂徕（公元 1666—1728 年）。但是他们二人的孔子观也是不同的。

对于伊藤仁斋来说，孔子是绝对的圣人，他推崇《论语》是“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他在《论语古义》中说，“《论语》一书，万世道学之规矩准则，其言至正至当，彻上彻下，增一字则多余，减一字则不足，道至此而

尽，学至此而极……孟子曾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人的话语，（孔子）远胜于尧舜。”又说，“有生民以来，从来没有人像孔子这样受崇敬。看来，诸子直接聆教于夫子，知夫子确实比任何圣人卓越，留言于后世。我决心以《论语》为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原因就在这里。”从这热情的话语中就能充分了解到伊藤仁斋如何尊重孔子。孔子是众圣人中特别突出的特殊圣人。

《论语古义》离开后世的注释，直接就《论语》探讨孔子的真髓。作为辅助研究对象，伊藤仁斋重视对于《孟子》的研究，因此，他作有《孟子古义》。

伊藤仁斋认为，《论语》主要是平易说教，《孟子》主要说由孔子之教而来的道，并与教是统一的。伊藤仁斋所发现的孔子的精神是仁，仁就是出自真正给人以利泽的普遍的人类爱。

明治末期以后，人们才不把孔子当作圣人，而作为客观的、学术的研究对象。

《赵氏孤儿》在西方

《赵氏孤儿》是元杂剧家纪君祥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和《史记》等文献而编写的一出悲剧。记述的是春秋晋灵公时，赵盾与屠岸贾两族之间因政治斗争而发生矛盾冲突，权臣屠岸贾因而杀戮赵家满门300余口，赵家门客程婴、公孙杵臼等，以忠勇气概，舍身救护赵氏孤儿的经过。这是一出表现忠臣义士与权奸弄臣斗争的历史剧，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歌颂了忧国忧民、忠直清正的英雄人物，鞭挞了狠毒凶残的奸臣。全剧矛盾尖锐，冲突激烈、角色性格鲜明，英雄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感人至深，充满浓烈的悲剧气氛，几百年来在中国经久不衰，成为我国古代文艺史上灿烂的瑰宝，影响深远。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出典型的中国悲剧，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震动。在《赵氏孤儿》产生500年后，一个在中国传教并精研中国文化的法国人马若瑟看到了它，不禁被深深感动。他认为这是一出很具中国味的悲剧，真正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程度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于是在1731年，他将《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并托人带回法国，登载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立时读者如潮，好评叠起，迅速传开，《赵氏孤儿》也就成了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马若瑟由此而成为第一个将中国古典戏剧介绍到欧洲去的人。可喜的是，《赵氏孤儿》法译本一经发表就赢得了一片叫好之声，人们纷纷趋之而读，英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相继出现，剧情迅速传遍欧洲。

《赵氏孤儿》不仅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曲折情节折服众人，且对欧洲戏剧文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戏剧评论家、剧作家的浓厚兴趣。此后80年中，欧洲相继出现了四五种改编本，英国剧作家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意大利人把它创作为《中国英雄》的歌剧，都获巨大成功。而当时欧洲文学巨匠、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读到马若瑟译本后，即刻也对其产生热爱之情，他说：戏剧之发达，最早仍莫过于伟大的中国和雅典！并认为此作品比欧洲同时代戏剧要高明很多倍，简直是一部伟大的杰作！评价非常之高！而且他还着手改编马若瑟译本，于1755年写成了名为《中国孤儿》的大型五幕历史剧。不同的是，伏尔泰的剧本把故事从春秋时代移到了元朝，讲成吉思汗占领北京后，搜捕前朝孤儿王子及托孤寄命的忠良大臣冒死救孤的感人故事。当然，伏尔泰《中国孤儿》的写作另有动机。1775年此剧在巴黎首次公演就引起轰动，各种报刊纷纷点评，给予高度赞扬。有的报刊甚至由此评论：伏尔泰是18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英国作家也加以修改，在伦敦上演获极大成功，剧本很快风靡欧美舞台。就在《赵氏孤儿》红得发紫之际，另一个偏爱中国文学和哲学、当时德国的大文豪歌德，也对之发生了浓厚兴趣，受此剧的启迪，他着手创作歌剧《爱尔潘诺》，这出德国式的悲剧虽未最终完成，但从其创作意图，也可见《赵氏孤儿》对这位大作家的影响。

18世纪《赵氏孤儿》，风靡欧洲，使许多西方人了解了中国古老灿烂的文化和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并且对欧洲戏剧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与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中国造纸技术的西传

造纸，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并列为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自从公元 105 年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以后，纸的生产质量和数量都大为提高。公元 2 世纪，洛阳建立了造纸场。由于军事和外贸的需要，新发明的纸迅速传入河西走廊和新疆，随后越过葱岭继续传向中亚、南亚和西亚。造纸技术也在几个世纪以后沿着这条路线向西传播扩散，逐渐化为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技术。

高昌（吐鲁番）是纸和造纸技术西传的前哨。从 6 世纪下半叶高昌开始造纸，7 世纪时高昌有了自己的“纸师”。唐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7 月，唐帝国与大食（阿拉伯）在恒逻斯（今吉尔斯塔拉斯河边的奥里·阿塔）发生军事冲突。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唐军和中亚民族的联军，与大食齐亚德·伊本·卡利率领的军队交战，结果唐军大败，2 万名唐军被俘。阿拉伯史书特别提到战俘中有造纸工匠。这些工匠把造纸技术传入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帝国造纸业的开山祖。

撒马尔罕的造纸业在公元 8 世纪中叶建立后几个世纪中，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因为有技术熟练的中国工匠操作，撒马尔罕所造纸张质地精良，销路迅速扩大。公元 794 年，在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开设了新的造纸场。巴格达造纸场的技术力量是由撒马尔罕提供的。

此后，巴格达政府明令，政府的公文正式采用纸张，以代替传统的价格昂贵的羊皮纸，阿拉伯帝国在阿巴斯统治期间，纸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于是掀起了一个造纸的热潮，因而在 9 世纪时，西亚又陆续出现了两个新的造纸场。

先是在阿拉伯半岛南端的蒂哈玛建场，用植物纤维作原料；不久，又在大马士革设立规模宏大的造纸场。但是，撒马尔罕造纸场由于不断改进技术，直到 11 世纪仍然是阿拉伯的造纸中心，在中亚和西亚一直享有盛誉。在阿拉伯境内设立的这些造纸场，对推广纸张的使用起了决定性作用。

早期阿拉伯纸的制造，从原料的选用到工艺技术，完全按照中国的传统方法。大麻和桑皮是中国惯用的制造纸浆的原料。为了适应本地的条件，撒马尔罕的中国造纸匠逐渐试验，改用中亚和西亚盛产的亚麻和桑科植物纤维作为原料。这使阿拉伯的造纸业得以独立发展。

公元 9 世纪末，造纸技术传到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造纸场。从此，纸不但从亚洲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中海沿岸各地，而且，一贯以苇纸为书写材料的北非，也开始使用自己生产的植物纤维纸。10 世纪中叶以后苇纸在北非绝迹了。通过埃及，造纸技术传入西西里岛，并且沿地中海继续西传。大约在 11 世纪下半叶，摩洛哥的都城非斯也开始造纸。

12 世纪 20 年代，造纸技术从北非传到西班牙，萨狄瓦有了造纸场。公元 1189 年，卡塔伦尼亚开设赫洛尔造纸场。1276 年意大利开始造纸，此后，以意大利为先导，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兴起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造纸技术在欧洲得到迅速传播。1391 年，造纸技术传到纽伦堡。14 世纪末、法兰西和德意志为中心，造纸技术向东、西面传播。1491 年，波兰建立了造纸场。从 15 世纪开始，以德意志为中心向东、西两面传播。1498 年，奥地利的维也纳也开设了造纸场；1511 年，英国开始造纸；1576 年，莫斯科兴建

造纸场；1635年造纸术传到丹麦，1690年，传到挪威。随着欧洲殖民者势力向外扩张，造纸技术也被先后带到美洲和大洋州。1575年，墨西哥有了造纸场。到1690年，北美的费城兴起了造纸业。1868年，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有了自己的造纸中心。

造纸技术在欧洲迅速传播，对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欧美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与纸的广泛应用有着直接关系。造纸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重要生产部门之一。

“马背文化”走向世界 ——内蒙古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回顾

改革开放犹如一股劲风，吹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的风帆。地处中国正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以骏马般的身姿，驮起瑰丽无比的民族文化乘风疾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路上越来越宽，越来越活，向世界展示着“马背文化”独特的风采。

自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派出第一个对外文化交流团组以来，16年中，共派出各类文化艺术团组150个，1700多人次。这些团组分别赴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的3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访问。商业性演出、文物与画展览和其他文化交流活动，演出约4600场，文物展览42个月，观众总计达1200多万人次。1981年仅派出团组3个、11人次，观众人数为2万。到了1995年派出团组达23个、322人次、观众人数达320万。同时，我们接待了来自美国、日本、法国、比利时、哈萨克斯坦、韩国、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约90个团组、800人次的演出和访问考察。可以看出，内蒙古的对外文化交流从少到多，团组人数逐年增多，范围领域逐年扩大，呈现出不断扩展的好势头。丰富多采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对弘扬蒙古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增进内蒙古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友好关系，促进经济文化全方位开放，起到了积极作用。“马背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民族歌舞神韵独具

素有“歌海舞乡”美称的内蒙古，民族歌舞以其优良的传统和深厚的底蕴繁茂于世界文化之林。那热情奔放的蒙古族舞蹈，悠扬的长调，深情的马头琴，还有那一人用口、喉、鼻同时发出两个甚至是四个声部的“浩咪”演唱，无不受到世人青睐。1993年，内蒙古歌舞团赴澳门参加“国际艺术节”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当“浩咪”演员唱出第一声时，观众便被震惊了，美妙的和声，宏远的穿透力，赢得了狂潮般的掌声。新闻媒介评论，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演唱，最古朴的和声。内蒙古歌舞团马头琴乐队曾两次赴日本演出，当他们第二次出现在日本观众面前时，竟有许多观众追着乐队要拜师学艺。有一位跟随乐队连看过四场演出的观众拉着演员的手激动地说：“马头琴是这样神奇，乐曲美妙动听，感人肺腑，真像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在交流形式上，我们力求打破以往单一项目交流格局，探索多种交流形式。派往台湾的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访问团将歌舞、马术、展览，风味小吃融为一体，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台湾味全埔心牧场，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精彩的蒙古族歌舞和马术表演，还可以欣赏内蒙古风光摄影展，品尝到烤全羊等蒙古族风味小吃，使人们“足不出户”就领略到蒙古民族的文化风情。艺术团在台湾3个月，共演出150场，观众达30万人次，创下了大陆文艺团体在台湾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观众最多的记录。

二、杂技艺术特色浓郁

国际文化市场对中国杂技可谓：“情有独钟”，需求量大。我们认为，内蒙古杂技要走向世界不能单靠高难惊险，而是要有一批富有蒙古民族特

色、风格浓郁、形式新颖的节目，我们把它叫做“号准脉，找准门”。经过多年努力，内蒙古杂技团创作出《四人踢碗》、《蹬方造型》、《三人蹬技》、《射箭》等一批高质量、高水平，民族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作品参与竞争。1988年以来，内蒙古杂技团出访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演出4210场。1995年该团取得了“三渡东瀛、一赴泰国”的成果，累计演出25个月，共2023场，观众达94万人次，创下3年内对外演出时间最长记录。1994年，内蒙古杂技团在日本著名的琵琶湖畔演出6个月，由于注重管理，节目精彩，纪律严明，团结协作，给日本观众和接待单位留下了极好的印象。1995年，日方再次邀请该团前往演出3个月。连续邀请同一剧团赴同一地演出，在有30年历史的琵琶湖游乐园还是头一次。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叫得响、拿得出、特色浓的节目，使得内蒙古杂技团在对外文化交流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前程似锦。

三、文物展览优势显著

内蒙古地理结构复杂。地质史时代全、门类多、分布广、保存好，从25亿年前到1万年前几无缺环，素有“化石之乡”的美称。这块土地曾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活跃的大舞台，他们共同创造了辉煌的草原文明，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资源。几年来，我们在充分利用内蒙古文物在历史、民族、古生物化石三大优势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将对外文化交流作为文物优势开发转换的重要手段。利用文物之优势，变“死宝”为“活宝”，筹办了6个大型展览，分别赴5个国家和地区12个城市展出、文物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题为《中国内蒙古大恐龙展》的古生物化石展览，1992年首次踏上日本国土，就以40天吸引观众60万人的绝对优势，领先于同时在东京展出的美国、俄罗斯恐龙展。次年，该展再赴日本展出了3个月，又创下了观众50余万的佳绩。1995年此展移师美国，在亚特兰大市展出9个月，近50万人纷至沓来，成为亚特兰大市外展史上观众人数最多的展览。具有辉煌历史的“马背文化”，带着浸透了乳香的迷人风采，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中，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走向了繁荣。

华夏古瓷惊四海

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珍藏着许许多多的中国陶瓷。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内设有“东洋馆”，整个二楼5个展室都陈列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其中不少是陶瓷，从原始彩陶到唐宋以后的陶瓷等，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件中国浙江烧制的“天鸡壶”，是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泡茶闭壶，其嘴呈鸡头状。中国陶瓷在日本的出土文物十分丰富。据1985年统计，日本全国在近800处遗址中发现了中国陶瓷，其中主要有越窑、龙家窑的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白瓷，建窑天目（黑釉）瓷等。

东京、京都、奈良等日本国立博物馆都陈列着大量的龙家青瓷。龙家青瓷始于五代，盛于宋朝，一千多年来，它一直以端庄浑朴的造型，青翠晶莹的釉色著称于世，被人们誉为瓷中瑰宝。明代，著名的龙家青瓷匠师有顾仕成，他所主持烧造的青瓷，铭记有“顾氏”二字，其中有一件直径约4寸5分的青瓷碗，珍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奈良市的法隆寺珍藏了唐代越州窑的回耳青瓷药壶，高8寸7分，直径4寸5分，曾为天皇所使用。当这一稀罕的宝物在1939年奈良市博物馆公开陈列时，前往参观的人如山如海，即使在亮敞的陈列馆内，也挤得水泄不通。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一个海滨城市，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萨莱博物馆收藏的陶瓷物一万件。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产的。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在世界上为数不多，据说总共不过200件左右，但仅在这里就集中了80余件。元代的青花瓷是在美丽的白瓷大盘和大碗上用奔放的笔调画出菊、牡丹等花卉，或画出松、竹等植物以及山水、人物等，再巧妙地配上一些龙凤等动物图形，特别是许多龙家大盘，盘的中央浅雕着花草云龙，大方端庄，确具魅力。这样的大盘，价值连城。还有不少从中国输入的瓷器，土耳其的工艺师们使用镶嵌方法镶入黄金和宝石，制成华丽的装饰纹样，把瓷器打扮得更加绚丽多姿。

菲律宾人历来珍视中国瓷器，平常将瓷器埋在地下，节日才取出一用；用后又再深埋地下。因此发掘品很多是完整的。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收藏的5000多件陶瓷藏品中，除少数属于泰国、越南、日本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汉代到明代的产品，这些藏品都是从印尼各地收集来的。在东南亚各国博物馆所藏的明代陶瓷中，雅加达博物馆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有明代的单彩、三彩、五彩、白地青花瓷器。

马来西亚是目前所知道的出土中国瓷器最多的地区。吉隆坡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批中国明代瓷器，大部分是景德镇的产品。

1989年，韩国的清州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国瓷器特别展览会，把在韩国出土的中国瓷器收集到一起，为研究中国对其瓷器文化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条件。在这些展品中，有从汉代到清代的青瓷、白瓷、唐三彩等，共83件。其中有第一次公开展出的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中国白瓷灯盏。该灯盏出土于韩国武宁王陵。武宁王陵建造于公元259年。还有一件东晋时代的青瓷羊形器也十分珍贵，其形象像一头跪着的小羊，色呈深绿。它是在韩国红原道源城出土的一件殉葬品。

实际上，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品所到之处远远不止已提及的这些国家。中国陶瓷在外国以无比高贵的姿态，闪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光辉。

唐诗在欧美

中国唐代诗人的很多瑰丽诗篇流传到欧美和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珍贵的遗产。

最早被译成外文的唐诗是王涯的五言绝句《送春词》。这首唐诗由法国汉学家钱德明翻译。他是于公元 1750 年奉派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精通汉语、满语。他在其编著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丛书 16 卷中，除有唐诗《送春词》译文外，还向西方介绍了唐诗及诗人李白、杜甫。

向西方介绍唐诗的先行者还有英国的德比时爵士和汉学家翟理思。1829 年，德比时出版了他的专著《汉文诗解》，书中介绍了李白的生平还将王涯的《送春词》及杜甫的《春夜喜雨》译成英文。翟理思则把唐诗作为专题，集中进行了翻译和介绍。

20 世纪以来，欧美各国的文学家翻译中国唐诗蔚然成风，其中有不少唐诗被谱成歌曲和交响音乐。1905 年，德国作家贝特出版了名为《中国之笛》的中国古诗集。“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的这首名诗被收入《中国之笛》中。瑞典作曲家斯约格伦和奥地利作曲家威柏思先后把《中国之笛》中所收的唐诗谱成了歌曲。此后，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和《静夜思》，也被许多欧洲作家谱成歌曲。德国指挥家和作曲家冯·弗兰肯施泰还把李白的故事编成歌剧《皇帝的诗人》。王维的《送别》被马勒用作《大地之歌》末乐章的歌词。捷克作家科豪特也在一部声乐套曲中用了王维的《杂诗》和白居易《问刘十九》。法国作曲家罗塞尔把张籍《节妇吟》的最后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谱成了一首出色的歌曲。

本世纪以来在欧美产生深远影响的唐诗译著，首推英国的阿瑟·韦理于 1918 年出版的《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在他所译的唐诗中白居易的诗占了 59 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当代诗人，新诗运动领导人庞德出版了以翻译唐诗为主的《神州集》，第一次把当时欧美诗人和读者最感动的题材——愁苦，突出地表现出来，他们深深感受到中国诗的强烈“现实性”。在美国新诗中，不少诗人学习中国诗人的构思，把自然意象和愁苦主题结合起来。

《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和《神州集》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很大。美国当代著名诗人 W·S·默温说：“到如今，不考虑中国诗歌的影响，美国诗就不可想象，这种影响已成为美国诗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70、80 年代以来，美国成为西方世界唐诗研究中心。1981 年，美国成立了“唐代学会”，世界各国唐代文学研究者均可申请入会。该学会成立以来，已出版了 10 辑带有年鉴性的《唐学研究专辑》。

唐诗也是法国文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法国学者认为，唐诗是中国古诗的高峰，描写自然是唐诗的重要主题。1986 年出版了法译《云游四方的诗人》，共收集、译出 300 余首寒山诗，对西方的“寒山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语在东南亚

海外华人在东南亚为数最多，汉语在这些地区的应用和发展情况最典型。早期华人为了谋生移居南洋，绝大多数是贫苦人民，少有机会受教育。但他们对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却是一往情深，并重视子女教育。只要经济上稍有余力，便会集资创办华文学校。尽管面对着不少困难和压力，仍竭力克服。

50年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沙捞越和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可说达到了高峰，当时学生人数仅马来半岛即达到39万余人，并且集资在新加坡建立了海外华人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南洋大学。这样，华文教育由小学至中学到大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当时学习华语的，除了少数的异族人士之外，几乎全为华人子弟。不过当时也存在华人子弟分别受中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两种教育源流；而受英文教育者受英国殖民政府支持、保护和照顾，学生就业出路和社会地位，都要比受华文教育者优越。尽管如此，多数的华人仍选择自己的母语教育，自谋出路，自闯天下。以马来半岛而言，50年代华校的华人学生有39万人，而英校华人学生却只有23万余人。华人这种对自己语言文化的执著情怀，在海外汉语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珍贵的记录。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印尼的华人教育在1965年被禁止。马来西亚的近60所华文中学也在60年代被令改制，成为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型中学。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进入低潮。

在新加坡的华文中小学也逐渐改为以英语为主的学校。同时，作为华文教育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更是面对着重重困难和压力，最终在80年代初，被合并到实行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大学，组成以英语为媒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到了70年代，稍有机会时，马来西亚的华人重新筹款，另起炉灶，另外兴办“独立中学”兼授汉语、马来语、英语，成为马来西亚教育系统中的重要部分。目前，全马已有华文独立中学60所，学生58400人。由于很多独立中学成绩好，成了家长们争相抢送子女受教育的学校。因此只有成绩较好的学生才能获得入学资格。

在华人占有相当数目的泰国和菲律宾，华文教育也都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汉语在这些地区还不能太大的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当地华人的不断努力，马来西亚的汉语教育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已有3万名马来族的学生也在学习汉语。

京剧在澳大利亚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又堪称世界的经典艺术。悉尼歌剧院和墨尔本艺术中心是澳大利亚享誉世界的艺术殿堂。1995年10月，这两种世界精粹结合起来了。中国京剧团在这两座富丽豪华、独具一格的艺术殿堂隆重演出，数千观众陶醉在京剧艺术表演中，掌声、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两种精粹结合成功了。

中国文化部刘忠德部长去年访问澳大利亚促成了这两个精粹的结合。他很赞赏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华君锋常常呈现在梦中的愿望，即在任期内将国家艺术瑰宝中国京剧引到悉尼歌剧院这样的艺术殿堂来演出。天缘巧合，一次华大使向澳大利亚电讯公司集团总经理查礼·估伊谈起此事。查礼先生认为：通过两国文化交流，促进彼此的理解，扩展商业和经济的合作，使商业、文化、社会的相互理解与欣赏和发展结合起来。两人一拍即合。刘忠德部长访澳时又欣然与他们一起达成口头协议：由澳大利亚电讯公司出资赞助，邀请中国优秀京剧艺术家来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和墨尔本艺术中心音乐厅演出，白天彩排招待中小学生。1995年4月，查礼先生亲率代表团来华，刘忠德部长亲自设宴款待，并出席他们同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出访协议的签字仪式。嗣后又亲自选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及青年京剧团的优秀演员组成赴澳京剧团。

悉尼歌剧院造型非凡，不愧为世界名筑。世界很多著名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到这里向世界展示辉煌。

1995年10月24日晚，中国京剧团首场演出。悉尼歌剧院灯火辉煌。2000多座位的豪华音乐厅座无虚席。来客中有新威尔士州总理卡尔夫夫妇，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州代理总督兰埋纳夫妇，华君锋大使和我驻悉尼总领事段津，以及政界显要，工商、文化界巨头，各华人社团的领导人。京剧团演出折子戏《雁荡山》、《香罗帕》、《将相和》、《大闹天空》和刘长瑜的清唱，全场为之震动，热烈鼓掌，谢幕达7分钟之久，表达了悉尼观众对中国京剧团表演艺术家的赞誉和敬意。州总理卡尔、代总督兰埋纳、华君锋大使上台向演员献花，观众又掀起一股热浪、台上台下一片欢腾。

京剧团演出后，中英文报纸纷纷刊发评论和图片新闻，澳洲《华声日报》以中国京剧团演艺精湛轰动雪梨《雪梨歌院贵宾如云全场爆满》为题，报道了演出盛况，还有其他中英文报刊和电视台、电台也频频报道，表明中国京剧在世界著名歌剧院演出成功了，受到了悉尼的观众欣赏和热爱。

1995年10月27日，中国京剧团在墨尔本艺术中心的音乐厅演出时又是高朋满座、贵宾如云，观众热烈程度有如悉尼歌剧院。维多利亚州总督、艺术部长和华君锋大使在演出后招待酒会上热情讲话，赞扬京剧艺术精彩绝伦，许多来宾和演员相互交谈，合影留念，久久不愿离去。

中国京剧在悉尼歌院和墨尔本艺术中心演出成功，又一次向人们显示，中国京剧完全可以进入世界上流社会、高层艺术殿堂，关键是寻找恰当的媒介和渠道，抓住机遇。刘忠德部长和华大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先例。经济和文化融通和互补，开创了别开生面的外交境界。艺术的魅力往往能突破民族、国界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更多外交界、经济界领导能将外交、经济业务的发展和国家艺术瑰宝的开拓推向世界艺术殿堂，丝丝相扣，相互促进，无异将会促进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在世界艺坛闪烁其灿烂和耀眼的光彩，

为民族艺术振兴作出贡献。

中国音乐在北美

有谁能想到伦敦人扭秧歌，加拿大人唱粤剧、美国人说相声呢？然而，这是现实，他们非但演了、唱了、说了，还作了不少研究！这就是中国演唱研究会（简称 Cnoperl）组织和支持的一些活动。这个研究会是由美国和加拿大等地一些热爱中国“演唱文艺”的人们在 1969 年发起成立的，它以搜集、记录、研究和表演中国演唱文艺为宗旨，每年召开年会一次，并出版《论集》一册以便交流。

他们研究内容很广泛，首先是由于“中国演唱文艺”的含义极广，凡是口头表演的各种艺术形式，地区上从南到北，时间上由古至今都包括在内。除了没有人声的乐器、舞蹈等外，唯一的界限恐怕就是“中国”两字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涉及到昆曲、京剧、粤剧、评书、山东快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单弦、相声、竹板书、南方说唱、南方滑稽、广东小曲、福建南音、香港船民歌曲、秧歌、话剧，甚至佛教仪式中背诵经文的曲调，通俗宗教仪式说唱等。当然，这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还只是小小的几丛，但，这是可喜的进步，而且是十分有力的起步。

从《论集》的文章看，有旁征博引，研究深入的学术性文章，如《中国小说中的口语因素》、《三侠五义及其与口头文学的联系》、《昆曲演唱技巧及记谱》、《论北方乐剧的发展》等；有系统的历史性论述，如《昆曲唱腔集及其来源》和《20 世纪 20 至 60 年代的昆曲演唱实践》等；有专题调查报告，如《随粤剧团往返台湾的一次演出》、《香港船民歌曲》、《佛事供天中的五大吟诵类型》和《一次现场试验》等；有现场笔记，如《北美粤剧随笔》和《现场报导两份》等；有文艺评论，如《1978 年以来的话剧：有限的改革》和《唐王李世民的艺术形象》等；也有各地演唱文艺活动的介绍，如《报导一次秧歌试验性演出》、《教学片：中国通俗宗教记录》和《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档案馆》等。有的翻译了原文，如相声《空城计》和《海燕》，有的还注译了曲谱、标明了字音，如单弦《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总之，既有理论探讨，技巧研究。也有情况介绍，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一篇有关博物馆的报导，记该馆收集了各种有关文艺形式的服装，道具、唱本、说明书等实物，注有日期，戏目（曲目），甚至使用者姓名等。使人能从形象上进一步加深对古今各种艺术形式的了解，也很有意义的。

该会成立以来，活动正常，现成员已遍布美国各州及加拿大各主要城市；欧洲方面，联系面也扩大至英国、法国、西德、瑞士、荷兰、挪威、芬兰、甚至苏联和以色列。《论集》的发送范围还远至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以色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加强了和国内联系。1982 年曾派人专程来京访问，学习、交流；同台湾，香港等地也有联系。他们的活动也引起了包括语言、文学、文字学、戏剧、舞蹈、音乐、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人士的注意。

该成员中，有一部分人是属于中国血统，有些人还从事过文艺专业工作，他们身居国外，利用业余时间，介绍研究祖国文化，这种爱国热忱值得称赞。不过会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他们热爱中国文艺，愿为学习、研究中国文艺献身，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他们写的一些文章，观点角度和我们不尽相同，这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有交流就会有促进，有促进也就会有提高。

“丝绸之路”通美洲

中国与美洲联系，有殷人东渡的传说，有慧深和尚到过“扶桑”的记述，但这并不能证实中国人到过美洲。中国与美洲真正的密切联系与接触，是从近代开始的。这种联系，与殖民主义者所建立的欧洲—亚洲—美洲的贸易航路有关。从航海上说，这种联系是间接的。

随着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的冒险家们在黄金梦的驱使下，向西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路，如西班牙，在1519年占领了墨西哥，随后，在太平洋继续沿反时针方向挺进，在1570年占领菲律宾的吕宋岛；与此同时，随着达·伽马开辟通往亚洲的新航路，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在印度洋节节向东推进，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如葡萄牙，1510年占领了印度的果阿，次年占领了马六甲，到1517年就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广州、澳门、30多年后的1557年，狡猾的殖民者以“请求晾晒货物”为由，就把澳门变成了自己的地盘，不到数年，此地区已是“夷众权弓”。葡萄牙人的势力已经到达了远东的南中国海，从澳门再向东，就与占据菲律宾的殖民势力西班牙相汇合了。于是，在殖民主义的发轫阶段过后，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世界上的殖民贸易航路连为一体了。

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香料贸易中，葡萄牙人主要建立了澳门（中国）—里斯本（葡萄牙）—巴西（美洲）的“香料之路”。西班牙人则主要建立了一条塞维尔（西班牙）—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马尼拉（菲律宾）—中国的闽粤沿岸港口的又一条“香料之路”，十倍、百倍的商业利润，使欧洲冒险家和商人们不顾大海波涛的凶险，不畏途程的遥远，扬起了他们的三桅帆。于是，东方的香料，中国的丝绸，被西班牙、葡萄牙货船辗转带到了欧洲，带到了美洲。

主要的航线是菲律宾和美洲之间。它的一端，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另一端，是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这是西班牙人所垄断着的航路。这条海路上白帆点点，一艘艘船大多都是经过于上述两个地点的，人称为“马尼拉商帆”。

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距马尼拉大约只有600海里左右，西班牙人的到来以及美洲航线的开辟，客观上使传统的中国与菲律宾的联系及贸易进一步延伸，以马尼拉为中转站，中国人、中国货物及其中国文化随着商帆贸易，跨越太平洋，在美洲大陆登陆，中美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中国商船满载货物驶往马尼拉。据日本学者箭内健次估算推测，在16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有20余艘中国船来到马尼拉，在90年代有30余艘，到17世纪初，则已增加到近50艘了。在这里，中国货又被装上一艘艘西班牙殖民者控制的三桅帆船，乘“太平洋黑潮”和季风，东航到北美后再南下，到达阿卡普尔科。

中国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马尼拉，而后又被运往美洲。在众多的货物中，最多的是生丝和丝织品。据统计，在1636年以前，每条船上装载的丝织品和生丝约三四百箱，到了1636年，情况则大不一样了，每条船装上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丝绸，马尼拉的港口记录中，有一条船装载的丝货超过1000箱，还有另一条船上装载了1200箱。

在美洲，中国丝绸物美价廉，深受当地人的欢迎。贵族们日常穿着丝绸服装，僧侣们用丝绸缝制法衣，连贫穷的印第安人也以中国丝绸为装饰。丝绸，已经成为当地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装有中国丝绸的商帆一

到港，迢迢万里运来的丝绸就被销售一空。墨西哥著名诗人布兰西斯·布雷特·阿特在诗中写道：“每年一次的中国船啊，运来沉沉的橡胶、香料和光滑润泽的丝绸，堆积在阿卡普尔科的港口。”

瓷血与丝绸并列，成为大商帆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又一种中国商品。中国瓷器运往美洲的最早记载是在 1573 年，有两艘驶往阿卡普尔科的商船上装有中国瓷器，其数量为 22300 件。此后，关于瓷器源源运来的记载比比皆是。在墨西哥的殖民贵族中，拥有中国瓷器的多少，成为衡量其财富和文明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农作物也随船传入美洲。如茶树、湘橘、樱桃、芒果等等，使当地人的食物更加丰富。与此同时，印第安人培植的农作物——玉米、西红柿、花生、红薯、马铃薯、烟草等，也被带回到大陆，逐渐在中国生根，从那时起，我们的餐桌上又增添了许多美味佳肴。马尼拉桅帆带往美洲的不仅是丝绸、瓷器等货物，而且还带去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在 16 世纪初，马尼拉有大约 3 万华侨。此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又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在马尼拉商帆的终点阿卡普尔科，有相当数量的亚洲人居住，其中有许多中国人。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当地建筑中国式的房屋，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也带到那里，渐渐地，当地形成了中国人十分集中的街区“唐人街”。中国人的到来，“唐人街”的形成，在实际上意味着中华文明和墨西哥文明迎面相逢。在无形中，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渗透到美洲人的生活中。在墨西哥，中国的摇扇、梳子、风筝、爆竹成为当地受欢迎的商品，并且渐渐地成为当地人的生活习俗的组成部分，在巴西，贵族的花园中有中国式的亭子和砖塔，其房屋也带上了中国式的顶檐，富有东方情调。

在墨西哥，流行一种样式十分好看的连衣裙，并且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在 17 世纪，一位中国公主被海盗拐骗劫掠到墨西哥，在奴隶市场上，她被卖给一个大商人为女仆，她设计了一种无带长裙，黑色底衣上加红、白、绿色的绣花以及金色镶边，十分好看，于是，妇女们纷纷穿起这种飘飘欲仙的无带长裙。显然，这只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并不一定真实，但是，故事反映了墨西哥人对中国服饰文化的爱慕，中国的丝绸、瓷器征服了美洲，虽然在表面上有几分相像，但是，在本质上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黑暗入近代，中国已渐渐不再是强者，通往美洲的航路也已是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把持着，说到底，这条路是殖民贸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到后来，为大批的中国劳工随着欧洲轮船到美洲谋生之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条航路就不再是带来财富和希望的“丝绸贸易之路”，而成了充满艰辛和眼泪的“苦役贸易之路”了。

清宫文化在柏林

在世界各地著名的国家博物馆，大都设有东方艺术馆。中国文物在这些东方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柏林的东方艺术馆也不例外。此馆的陈列布局，跟我们故宫历代艺术馆颇相近，都是以文物类别为区、时间顺序为线排列的：先青铜，后陶瓷，再书画，最后是工艺品。前3类文物，在我看来，精品不多。商周青铜器，大都是些常见而且形体较小的鼎、爵、杯什么的，陶瓷部分，也没有超出国内常见的唐三彩、宋汝窑、明清花。唯有工艺部分，可能是由于我专业背景的缘故，竟觉得它大放异彩！

一进馆室，便可见一组大型清式家具：一架近3米高的三扇围屏和一个1米多宽的宝座椅。远看的闪着蓝光。很像是珐琅制品，实际是紫檀嵌罗甸的工艺！片片罗甸在屏风扇面上嵌出一幅生动的八仙渡海祝寿连环图。其画面十分富丽华贵，人物个个情态逼真。他是清乾隆年制品，宝座椅及屏风所用的须弥座和毗市罩形式，只有清帝独享。

在这组家具旁，还有两件挂毯，亦是清文化。一件挂在墙上，大约2米长，1.5米宽，是海水江崖云龙须，上端织有梵文字六字真经。一件套在一根高3米、直径约10厘米的圆柱上，是海水江崖八宝纹。这件挂毯上的纹物和所采用的明黄与杏黄色，只有清宫廷才有权使用。

挂在墙上的那件，一条整龙被织成头身尾三截，似乎是从一块大毯子上截取的局部。但细看，这三截龙爪齐全，头身尾及爪的比例适中，似应是一条龙而不是三条龙的局部。而且，毯子两条侧边的织法，明显是锁边而无切割痕。黄色海水江崖云龙纹，在清代是十分严肃的花纹，皇帝一般只是在正式场合才用。如果它是铺设在宝座前，那么绝不会选用这奇特的三截龙纹，若是挂在寝宫的墙上，却又从未在清宫陈设档中见到这类陈设记载。

第二件原本就是织就的一圆筒！将它套在圆柱上，完全是用圆柱木支掌和表现毯子的全貌。若从八宝纹这种佛教常用的纹饰连想，或许仿圆筒状的毯子是悬挂或者立在宫廷佛堂中当经幢的？

这三件清宫文物，在德国一展中国清宫艺术的风采，也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一大传播。

北京风筝及其在国外的影响

风筝，最早始出于中国，而北京则更是中国风筝的荟萃之地，北京风筝中有其独具特色的宫廷味道。早在清代，风筝已成为由少数达官贵人手中的玩赏之物落入寻常百姓之家。随后发现了风筝艺术的兴盛之时，到了清末民初，北京风筝已形成了四大流派。

有名的哈氏风筝由人称“风筝哈”的哈国良首创，他于清代光绪年间在厂甸开设哈记风筝铺。经哈家几辈人努力，风筝技艺日臻完善，托、糊、绘、放样样精通。所制风筝选材严谨、骨架坚固、画工精致生动。其突出的品种有：云龙、蜻蜓、蝴蝶等鸟兽类，哪吒、刘海、张飞、钟馗等人物类。哈氏风筝花样繁多，各具特色，其代表作为“瘦沙燕”。有的风筝还被列为宫廷贡品。哈亦琦是“风筝哈”的第四代传人，现任北京风筝厂厂长，他于1989年参加了美国旧金山国际风筝赛，并荣获这些比赛的最高奖。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仅是文学巨匠，还是制作风筝的高手；他在《红楼梦》中曾多次描写了姑娘们放风筝的情景。他还有制作风筝的专著《南鹞北鸢考工志》，书中详细记叙了风筝扎、糊、绘、放的43种技法，因此形成了曹氏风筝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鼓镇骧、孔泽祥等人。鼓氏曾拜师于曹雪芹的真传弟子“风筝于”于景廉，故一脉相承，他的代表作品有金鱼、蛤蚧燕等。孔泽祥曾精心研究红学友曹氏的“风筝”，制出了地道的曹氏风筝，1981年，他的风筝在加拿大展出，在当地曾掀起了一股中国风筝热。

金福忠是金式风筝的创造人，他的“黑沙燕”是北京风筝的代表，具有粗犷豪放之风格，非常讲求放飞效果。黑沙燕只用黑烟子绘画，呈黑白两色，对比强烈，放飞高空后，在蓝天映衬之下，显得色彩鲜明。这就是老北京人熟悉的“黑锅底”风筝。

另一类是马氏风筝，他为名画家马晋所创。他将花鸟绘画与风筝技艺融为一炉，其风筝造型规整，画工细腻，设色典雅，形象生动，除放飞外，还适合近处观赏，是一种独具风采的壁挂艺术品，其作品常以瘦沙燕、蝙蝠、仙鹤为模拟对象。

现在金、马两派的传人为关宝翔，他在继承两派传统的基础上创出了自己的风格。他以制作伞翼、人物风筝见长，如花瓶、金鱼、关羽、和合二仙等。他曾应邀赴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六城市作风筝表演，深受好评。

如今，北京这四派风筝的优秀传人及一批不受流派约束而自成风格的风筝名艺人均已荟萃于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之中，为继承我国风筝的传统工艺，为提高北京风筝的工艺水平和放飞水平而勤奋不息，近年来已有十几次出国进行风筝展览和参加国际风筝比赛并多次荣获大奖。北京风筝，它不仅能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而且，也早已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飞向了全国，飞向了世界。

风筝，愿它能带着中国的微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风景线。为中国增添新的光彩，带去中国的骄傲和自豪。

中国音乐真神奇

我国的民乐艺术向来以其独具的特色享誉全球，它是我们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1997年10月，中国歌舞剧院民乐四重奏访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向以色列人民很好地展示了我们美丽的中国民乐艺术。

10月的特拉维夫，秋高气爽，海风习习。刚刚过完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的人们又在过洁茅节。这是以色列一年中最为忙碌也最为悠闲的季节。犹太人的节日很多。有节日便有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素有以色列“文化中心”和“不夜城”之称的特拉维夫市的文化活动尤其多：现代舞蹈节、民间故事节、电影节和市内音乐节等等，数不胜数。世界各国的演出团体像走马灯似地出没于特拉维夫。美国的阿尔文·艾黎舞蹈团、英国的皇家剧院、法国的爵士乐队和奥地利的管弦乐队等，纷纷来此一展风采。在这多如繁星的世界级的文艺团体中，有一支中国的文艺“轻骑”却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中国歌舞剧院民乐四重奏。”

在这支文艺“轻骑”抵达特拉维夫前后，以色列当地的《晚报》、《最新消息报》和《耶路撒冷邮报》等刊载了“四重奏”来此演出的消息。许多好奇的观众纷纷打电话给中国以色列大使馆文化处，了解情况。中国音乐“四重奏”是中国歌剧舞剧院专门为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访问演出而新组建的小型演出队，四种主要乐器分别为胡琴、笛子、扬琴和琵琶，这些都是对外国人民极具诱惑力的中国民族乐器。

音乐会以中国传统名曲《春江花月夜》揭开序幕。这首悠扬婉转的乐曲使特拉维夫市民耳目一新，把观众带进了中国江南那“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境地；深沉幽婉的箫独奏《苏武牧羊》使人联想起昔日荒漠草原上那位寂寞的牧羊人，感受到他那十余年孤苦辛酸的生活和眷眷的爱国之情；那苍凉凄婉、如泣如诉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把人们带到了“天下第二泉”边，使人感受到了一位民间艺人的生活遭遇和怨愤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那嘈嘈切切的琵琶独奏《黎族舞曲》把人们带进了迷人的夜晚，人们仿佛看到了一对对青年男女在月下翩翩起舞的情景……观众的情绪随着不同的曲目忽而宁静如湖水，忽而欢快如“百鸟投林”，忽而激越如“雨打芭蕉”，忽而兴奋如“金蛇狂舞”。这些奇异的音乐曲目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最后一首以色列乐曲《玫瑰之夜》更加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博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许多外国观众前去向演员们祝贺演出成功。有的观众久久不愿离去，问及有无唱片出售。有的观众对中国乐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表示一定要来中国学习，一位中年观众紧紧握住一位二胡演奏家的手，激动地说“这简直是魔术！中国音乐真神奇！”

中国杂技蒙特卡洛夺冠记

杂技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父辈、祖辈们无一不是看着杂技长大的。一提到杂技他们便会感到无比的亲切，扬着头、挺着胸，一副神气的样子，这时，他们会想到在北京的天桥和一个又一个的杂技之乡。不过，继而他们又会皱一下眉，无限遗憾地说：“哎，可惜现在看不到了”。其实，是他们错了，我们的杂技艺术依然亮丽、依然辉煌，我们的民间杂技永远是中国人的绝活——这是为整个世界所承认的。

第21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在袖珍之国摩纳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派出了两个节目代表中国参加比赛。结果，山东杂技团《车技》一枝独秀，以两场平均成绩超出银奖第一名11分的绝对优势摘取了该节唯一的金小丑奖，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该节上获得的第五个金小丑奖。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22个节目参加，均是由以摩纳哥国家元首首兰尼埃亲王为主席的组委会严格选定的。

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是国际马戏界公认的世界第一大赛场，有“马戏奥运会”的美誉。无论是比赛规模、节目水准，还是场地条件都属世界一流。

参加本届马戏节的22个节目共分为两台节目进行比赛。两台节目各演两场，评委根据每个节目在两场比赛中的表现分别打分，最后取二者平均分。

我国天津杂技团的张婷表演的《单手倒立》排在第一场，这个节目曾于1996年1月在巴黎第19届世界“明日”即“未来”杂技节上荣获第一金奖——共和国总统奖。今年，该团又根据蒙特卡洛赛场的特点对这个节目重新进行了编排。整个节目分为三段共7分钟。

表演开始时，场灯全部熄灭，随着音乐声起，在一束追光的照射下，黑暗中显露出一只洁白纤细的手，光晕逐渐扩大，只见张婷那柔软的身体缠绕在一个距地面一米多高的透明圆盘上，一个清纯美丽的东方少女展现在观众面前。她慢慢站起，手扶圆托，稍一发力，就将身体轻松地支撑起来，随着圆盘慢慢地旋转，犹如一只洁白的海鸥，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她在上面轻松自如地做着各种高难动作。这是一种失去平衡的平衡。外国马戏界人士评论这个节目时说：“在马戏的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如此优美，如此轻松地完成如此高难动作的演员。这个14岁的中国女孩拥有极具天赋的身体条件，她所作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高难动作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7分钟单手倒立给观众已至美的享受！”马戏界名人阿兰·弗莱尔说：“这个节目可以说是举世无双，难度登峰造极。每当我感到疲劳时，我就看一遍《单手倒立》的录像，看后顿觉轻松愉快。我前后共看了15遍录像，还没看个够，因为它确实是一种艺术享受。”

山东杂技团的《车技》排在第二场，这是由18名女演员集体表演的大型节目，它综合了国内《车技》节目的精华，在编排、服装、灯光和音响效果方面均有创新。该节目的表演风格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速度快。这是我国目前骑速最快的车技节目；其二，动作衔接紧凑。在动作编排上，动作组合的层次非常分明，起伏有序、弛张相间。动作组合之间辅以舞蹈动作作为铺垫，增加了综合艺术色彩，克服了以往单纯技巧表演的弱点；其三，情绪饱满。姑娘们在表演中始终情绪饱满，潇洒自如，面带微笑，无言中与观众进行了丰富的感情交流。

表演开始时，演员们排成两行，躺在木制地板上，随着明快的音乐节奏

和电脑灯射出的旋转车轮图案，双脚不停地蹬踏犹如骑车飞驰，继而场灯大开，只见四名姑娘身着桔红色服装，英姿勃发地骑着自行车鱼贯而出，在飞驰的自行车上，如履平地，上下翻飞。时而站在车把上，时而倒立，时而站在车座上，时而钻到大梁下，令观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高难动作有：“三飞车”、“三人跳肩”、“牌楼技巧”、“双肩踢”和“孔雀开屏”等。在表演“三飞车”时，只见四辆单车快速依次行驶，前三辆车的演员双脚踏在各自单车的前轴上，突然同时跳起，越过蹬车演员的头顶，落在后一辆车的前轴上，动作干净利索、整齐准确。“牌楼技巧”是一个独创的造型。三辆车直线行驶，每车载三节人，同时三车之间水平推举三人，形成由12人组成的“牌楼”造型，颇为壮观。“双肩踢”是两名二节演员在单车行驶中同时起跳完成后空翻飞行动作，落在后一辆车骑车演员肩上，该动作的稳定性非常难把握、做这个动作时，观众们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手里为演员捏了一把汗。但姑娘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动作。最后，身着桔红色服装的18名姑娘在一辆自行车上组成一个艳丽的“孔雀开屏”造型，将表演推向了高潮，感情始终未得到充分宣泄的观众们终于打开了闸门，他们觉得鼓掌已不能完全表达自己此刻的激动心情，于是用双脚跺起了地板，顷刻间，震耳欲聋的响声连成一片，这是马戏观众对自己钟爱的节目所特有的表达方式，演员们多次返场谢幕才得以平息。

一位法国记者很有感触地评论道：“《车技》节目无论难度技巧，还是编排、灯光、服装和音响效果，都是非常完美的。以前中国的杂技编导过于偏重难度技巧，对节目的艺术性重视不够，但近年来中国杂技节目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车技》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获奖结果由兰尼埃亲王宣布，当他宣布本届比赛唯一获金小丑奖的节目是中国的《车技》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四起。在颁奖仪式上，兰埃尼亲王亲自为《车技》节目颁发金小丑奖，王位继承人阿贝尔王子为《单手倒立》节目表演者张婷颁发银小丑奖。

本届比赛，我们成功了。这成功表明，我们的传统杂技艺术并没有消沉，而是在更加生机勃勃地生长着，它已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充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我们的文化又一次在外国风光，中国的杂技永远是中国人的绝活。

中国瓷器在拉美的传播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创造之一，被西方视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艺术独创，与丝绸一样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象征。中国与拉丁美洲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仍不能阻止中国瓷器文化的传播。

15 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使海洋贸易发展了起来，沟通了世界各地的联系，逐渐把世界纳入了一个整体的市场。由于海洋贸易便于瓷器的大量运输，使在新航路开辟前仅有西方王公贵族才能享有的中国瓷器成为殖民地拉美各地民众较为普遍的生活用品。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拉美各地先后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中国瓷器也随欧洲殖民者一起传播到了拉美。最初是葡萄牙商人，后来是荷兰等国商人贩运中国瓷器转销欧美各地。16 世纪初，在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贵族家庭中已有人使用中国瓷器。到 16 世纪后期从中国销往拉美的瓷器已占相当数量。本世纪 4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支考古队在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发掘出 70 余件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器。

17 世纪初，在巴西的上层殖民者家庭中已经广泛地使用昂贵的中国瓷器，有的用中国瓷器来装饰房间，有的用中国瓷器充当赌注，甚至用它作现金使用。西班牙史学家摩德加记载的这一时期一份关于中国商人携往马尼拉的货物单中，开列了各种商品，除了大量的丝绸、宝石外，还有各种“精美的陶瓷”。在巴西贝达卡绍埃拉学院有一座教堂就是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它的钟楼塔尖，显得分外豪华，使之更具有宗教神秘色彩和戏剧性效果。18 世纪以前，中国瓷器在拉美各地还只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拉美普通民众还与昂贵的瓷器无关。

18 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造瓷业进一步发展，产量增加，质量更加精美，加上航海技术的发达，海上运输进一步扩大，中国瓷器便大批销往拉美各地。销售市场也由巴西扩大到了墨西哥和南美广大地区。18 世纪后期，墨西哥一些贵族专门派人来广州大量订制绘有家庭纹徽和勋章图案的成套瓷器茶具或餐具。至今，这些中国瓷器在私人收藏中仍有不少被保存下来。为了满足拉美广大瓷器消费者的需要，在墨西哥的普韦布拉城还出现了 46 家制瓷工场仿制中国瓷器。18 世纪，中国瓷器在拉美各国已较普遍使用。

1822 年，巴西宣布民族独立时，一些巴西爱国者为了纪念民族自立，还在中国订做了一套瓷餐具，上面用葡萄牙文写有“巴西独立万岁”的字样。到 19 世纪后半叶，由于中国遭到欧美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与拉美的文化交流也遭到了破坏甚至中断。

中国古老的瓷器文化一踏上拉美大地就受到各地民众的喜爱，并对拉美各地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上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瓷器作为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象征源远流长，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拉美民众了解中国悠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窗口。

第二，中国瓷器不仅是精美的工艺品而且是实用的生活用具。它与中国茶文化一起传播到拉丁美洲就更显现出了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成为拉美民众的生活必需品。

第三，中国瓷器在拉美还是各种礼仪活动中的精美用具和装饰工艺品，

被广泛地适用于各种社交场所和教堂等高级建筑的装潢上，这也造成了市场需求量的剧增。

在巴西上流社会家庭里，中国瓷器被广泛地用于装饰房间，美化居室。中国的瓷器文化还在拉美与宗教文化结合起来，成为西方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桥梁。在各种宗教仪式上，僧侣们使用中国瓷器盛装圣水和作做弥撒时的用具等，这对于信奉天主教的拉美民众来说不能不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宗教这种无声的宣传在拉美民众中产生了崇尚中国瓷器的热潮。

第四，中国瓷器以独特的工艺美术文化和昂贵的价格，成为拉美各地收藏家争相购置的宠物，促进了中国瓷器在拉美市场的畅销。

第五，中国瓷器容易被拉美民众接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拉美居民自古就有制造和使用陶器传说，对陶器怀有崇尚和怀念之习俗。因而，当更先进的中国瓷器传播到拉美时，就立即得到喜爱陶瓷艺术的拉美各地民众的热爱，从而拓宽了中国瓷器在拉美的销售市场。

中国瓷器是中国和拉美早期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它把远隔大洋的两大洲联系起来，成为中国和拉美文化交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墨城中国钟楼

在墨西哥市中心布加勒里大街上矗立着一座中国钟楼，墨西哥人昵称为“中国钟”。钟楼高 15 米，是 20 世纪初典型的法国钟楼式建筑。

塔身由巨石堆砌和混凝土浇筑。楼顶穹影下，悬挂着一只古老的东方铜钟。塔身上部，四面各镶嵌一个壁钟，洁白的表盘上镶着翡翠指针。黑色的罗马数字，华美别致。南面铭牌中央携带着 4 个篆体汉字“同声响应”，四面铭刻着“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九月——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纪念——中华民国旅墨侨民赠”的汉字。东面铭牌用西班牙文镌刻着“中国侨民致贺墨西哥国独立一百周年”。北面是西文的碑文“1821 年 9 月 27 日——1921 年 9 月 27 日”。

据记载，1910 年墨举行独立战争 100 周年盛大庆典。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派张印唐为特使，携带作为礼品的中国铜钟到墨城出席庆典。旅墨华侨遂集资为这座钟修建了这个钟楼，以资庆贺。20 年代，钟楼曾毁于内战炮火。1921 年 9 月，旅墨华侨再次集资重建，并镌刻了钟楼上的铭文。其后，布加勒里大街历经沧桑，许多建筑随着岁月消失了，但“中国钟”岿然屹立并且一直得到历届墨政府的保护。一位十分钟爱“中国钟”的墨西哥学者曾深情地对记者说：“墨西哥人民尊重它，因为它是中墨人民友谊的见证！”

雾都小店的中国心

离“雾都”伦敦唐人街不远处的派克街 32 号是一座门面不大的两层小楼。这就是旅英华人邓家祥、林玮夫妇开办的光华书店。书店的店堂虽不宽敞，却在书架上摆满了中、英文和其他语种的图书与报刊。这些书刊多数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如今，这家书店拥有近万种图书和 1500 多种期刊，是欧洲最大最全、以销售中国书为主的书店。它还开展征订业务，已拥有 1500 多家长期订户。此外，它还经营中国的文房四宝，国画原作、木版水印画、剪纸、明信片、录音带、录像带、中文打字机和小工艺品。这些书刊与文化用品，既抚慰了华人的思乡之情，也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同时，它还将英国与欧洲出版的有价值的书刊介绍给中国的书店、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以帮助他们了解外国的有益经验。

邓、林夫妇近期又筹资在离光华书店不远处建立了华夏文化艺术中心。这是一座三层楼，面积五六百平方米，已举办过中华文化展览、中国儿童图书展览、中国书画展览、中国新年民间风俗展览，还举行过文化艺术讲座、报告会等活动。

回顾往事，30 年岁月如烟……

1964 年，邓家祥这个香港新界的农民之子刚满 18 岁，由于家境穷苦，无法上大学，为了谋生，只身漂洋到英国。他先在利物浦，后到伦敦，在中国饭馆打工。不久，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滋长出来：中国是文化古国，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而且在英国的华人也不少，为什么不开一个中国书店呢？然而，开书店谈何容易，资金、货源，人力、经验，他都缺乏。但他不是知难而退的人，他四处奔走，在朋友的介绍下，终于和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不久，又与香港三联书店等单位建立了关系。这样，他与一位印度友人合作，于 1971 年 5 月 1 日办起了小书店。

书店办起来了，困难依然不少。当时，中国的出版物极其单调，生意自然很难做。他除了付房租外，每周只剩下 5 英镑的生活费。有人劝他关门开餐馆赚钱，他谢绝了，说：海外华人不仅要满足“中国胃”，也要满足“中国心”。他咬紧牙关，坚持把书店办了下去。

就在邓家祥先生苦心经营时，从马来西亚到英国求学的华人小姐林玮像春天的蝴蝶飞进了他的窗口。她十分向往祖辈故土，崇敬悠久的中华文化，更崇敬邓先生的人品。她时常义务帮他整理图书。渐渐地，这两个血管里同样流着炎黄热血的有志青年相爱了，于 1973 年喜结连理。从此，他们志同道合，携手而行。书店整修一新，改进服务，扩大业务，热情待客。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好书源源不断地充实他们的书店，对中国感兴趣的华人、外国人也日益增多。于是，光华书店形成了今天的规模，生意日渐兴旺。

对此，邓先生激动地说：“书店能有今天，是因为有祖国做我们的靠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林女士也说：“如果没有华侨、朋友的支持和理解，哪有我们的今天呀！我们还要加倍努力，决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

掌中木偶舞动了友谊的纽带

1994年7月，在德国奥格斯堡第6届戏剧节和'94辛涅古拉木偶戏剧节上，来自布袋木偶戏之乡福建漳州的5名木偶表演者演出的《大名府》、《雷万春打虎》和《两个猎人》引起了轰动。虽然演出结束时已是深夜，但观众们久久不愿离去，纷纷涌上舞台，同演员与木偶合影留念。在17天中，他们在7个城市演出了10场，向德国观众展示了中国的奇妙的木偶表演艺术。

原来，这5名演员是漳州木偶表演班的师生，他们应邀来此参加木偶节组织的重点活动即木偶表演教育单位的交流。这其中还有段感人的故事。早在1993年3月德国辛涅古拉木偶戏剧院院长萨尔达赫先生和组委会主持人莫尼卡·波思女士，从有关资料上获悉漳州的掌中木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便不远万里专程到漳州作了5天的考察访问，在观看了木偶班师生的表演后赞叹不已，当即决定邀请该班师生代表到德国进行交流表演。

小小的掌中木偶成了中德人民友谊的媒介，漳州木偶走上了德国的报纸与荧屏。当地报纸先后发表采访报道，德国中部电视台对漳州木偶队进行专题采访，并在黄金时间播放他们的演出盛况。主办人雷思远先生对木偶队说：“你们演出风格少有，精彩极了，能看到你们的表演艺术，是奥格斯堡人的幸运。”出席大会的16名各国评委对漳州木偶队的观摩演出给予很高评价，他们说：“可惜你们不是参赛队，否则你们将被评为第一。”

阿姆斯特丹的神州医药中心

占地 1350 平方米，投资数千万荷兰盾，集医疗、教学、研究与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神州医药中心，座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繁华的唐人街区。该中心的门诊部设有中医内、外、妇、儿及针灸、推拿、骨伤、气功等科室（所），由中国的专家教授主持日常诊疗工作。

该中心配备有优质中药饮片剂六百多种，中成药四百多种，各种传统及先进中医医疗器械一应俱全。医院规模宏大，成为欧洲目前最大的中医医药机构。不少患者已在此得到了精心治疗，全荷兰及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的患者也纷纷慕名来此求治。与此同时，该中心还设立了欧洲中医针灸进修培训中心。

1995 年 10 月底，该中心在热烈气氛中隆重开业。当天出席开幕仪式的贵宾有：中国驻荷第七任大使张建民、荷兰卫生福利部高级官员哈姆林先生、阿市议会自由民主党主席豪特曼先生等知名人士数百人。开业典礼上，张建民大使高度评价了该中心在欧洲建立的重大意义，指出“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也将对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自从三百年前，古老的中医针灸术传入荷兰和欧洲以来，两国人民在此基础上增进了了解与合作，正如前不久阿姆斯特丹自由民主党主席、议员豪特曼先生所说：“这座中医医药中心的建立，使中荷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传统的中国中医医药机构不仅能服务于此地规模宏大的华人活动区域，而且为阿姆斯特丹的医药卫生建设增添了新的一笔，为本市最终成为欧洲最大的医药中心作出贡献。”他为该中心在本市的建立和日益发展感到自豪和荣幸，并认为这一中心的建立，也必将给荷兰首都经济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荷兰政府发言人最近向新闻界宣布，荷兰王国大臣不久将访问中国，而中国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工作将是大臣在中国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

